

調景嶺： 香港「小臺灣」的起源與變遷， 1950-1970 年代*

楊孟軒**

摘要

本文旨在陳述和分析香港調景嶺在 1950 年代和 1970 年代間的起源和歷史變遷。主要運用的史料為，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及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所收藏，大量有關調景嶺的文件資料。其他還包括，臺灣救總（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的出版品、香港 1950 年代第三勢力雜誌和國史館出版的口述歷史書籍等等。在移民社會史的面向，以跨界人群移動的角度進行分析，從一個反共、親國民黨的難民群體在香港的形成與其在歷史時空中的變遷——自 1950 年代難民營開始到 1970 年代以臺灣為文教中心的海外社群——來為當下在國際移民學界中，爭議性頗高的「流亡／離散」(diaspora) 群體概念，提供一個實例的辯證。同時，本文也嘗試將香港調景嶺和臺灣的「外省大遷徙」，作一個歷史化的概念性比較，來呈現 1949 年共產中國興起時所出現的百萬人口大遷徙，在各地因歷史環境相異而出現不同的相貌及發展。

關鍵詞：政治移民、國共戰爭、流亡／離散、難民、臺灣、香港、冷戰

* 本文在最初資料收集與其後的寫作過程中，分別受到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訪問學員計畫以及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贊助和支持，研究的初步成果於 2010 年 2 月，社會所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合辦的 IOS-IASA Joint Workshop of Young Sociologists 會議中發表。在此向這些單位表達誠摯的謝意。同時也要向社會學研究所的張茂桂、蕭新煌、王甫昌、林宗弘、黃庭康教授，臺灣史研究所的黃富三、許雪姬教授，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另外，筆者於 2009 年 10、11 月間赴香港收集資料時，受到許多人的幫助和啟發，包括了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主任 Bernard Hui、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韓佳、香港浸信會大學歷史系的黃耀忠、景嶺書院前校長張世傑、香港中國文化協會中山圖書館主任駱雅雯以及香港友人 Joseph Lau 和阮妙兆，在此也向他們致最深的謝忱。

**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 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來稿日期：2010 年 8 月 4 日；通過刊登：2010 年 11 月 5 日。

- 一、前言
- 二、相關研究回顧
- 三、理論、方法學、史料概述
- 四、調景嶺的起源
- 五、調景嶺難民營，1950-1961
- 六、徙置區調景嶺村，1961-1979
- 七、結論

一、前言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國府」）在戰後臺灣的難民援助機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之後簡稱「救總」），¹ 在1970年出版的《救總二十年紀念專集》中，提到香港的調景嶺時的描述是：

¹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於1950年4月，蔣介石在臺灣「復行視事」一月後成立，為蔣氏反共復國理念框架下之產物。表面上是「全國性的人民團體」，業務受內政部監督指導，並受政府承託，以人道主義、同胞愛等精神為出發點，專門負責中國大陸「災區」的救濟活動：如募款、空飄、接運及安置因共產暴政而流落海外的大陸人士等。作為一個「人民團體」，救總掛名的會員、理事包括了許多文化界、政商圈人士。實際上，該會長期受中華民國政府掌控，非一般民間組織。其主要目的為，利用海外人道救助之名來達到國際反共宣傳的成效之實。主導者如理事長谷正綱（1901-1993）和秘書長方治（1896-1989）皆為黨國政要。救總主要經費來自於內政部、電影娛樂稅以及民間捐款，每年會定期召開理事會議、業務會報，或於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決定工作內容與政策，定期發行的刊物有《救濟年報》等。該會同時也與外交部、僑委會及其他國民黨海外單位合作，動員僑胞，發展國際反共，擴展以臺灣為中心的政治勢力和文教事業，在戰後50年間相當活躍。近十幾年來，由於臺灣民主化、兩岸關係的轉變、理事長的世代交替、政黨輪替、經費來源枯竭等因素，救總開始大幅裁員，進行業務上的轉型。該會在1990年改名為「中國災胞救濟總會」，再於2000年更名為「中華救助總會」。詳見李正寰編，《谷正綱先生與救總》（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1991）；侯禹昌編，《耕耘：救總五十四載工作紀實》（臺北：中華救助總會，2004）。

調景嶺營，是我忠貞難胞集居之地，反共精神極為堅強，是港九二百萬流亡難胞團結的中心，故夙有反共精神堡壘的稱號。該營現雖已被香港政府改為普通徙置區，但仍無損於難胞之反共活動。現調景嶺營區，因歷經本會會同港九救委會進行各項公共建設，改善醫藥衛生，整個環境，業已面目一新。目前營區設有救委會駐營服務處，從事管理，仍維持原有自治精神。營區內有各省同鄉會及學術、宗教團體的組織，以及文化教育的設施；除本會設立之調景嶺中學之外；尚有附設小學的中學三所，小學七所，幼稚園三所，擁有流亡學生五千名左右絃歌不輟，頗具規模。²

1997 年調景嶺村清拆之前，許多外地的訪客都對這個青天白日旗海飄揚，小平房櫛比鱗次，明顯有別於香港其他社會的群體，感到十分的好奇。香港本地的居民則稱之為「小臺灣」。本文擬以香港調景嶺的起源和歷史發展，來探討移民研究「流亡／離散」(diaspora) 中的原鄉／祖國／國家、復國主義、跨界聯繫等概念之意涵。運用的史料包括了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及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所藏大量的英殖民政府調景嶺相關文件、臺灣救總出版品、相關報章雜誌和口述歷史書籍等等。筆者試圖站在移民社會史的角度，從一個反共／親臺難民社群在香港的形成與發展以及其和國府、救總的互動關係來探討，有所謂「小臺灣」或「海外反共精神堡壘」之稱的調景嶺給當下在國際學界爭議性頗高的「流亡／離散」群體的概念可能帶來的啟發。同時，本文也嘗試將香港調景嶺和臺灣的「外省大遷徙」，作一個歷史化的概念性比較，來呈現共產中國興起時，所出現的百萬人口大遷徙，在各地因歷史環境相異而出現不同的相貌及發展。

二、相關研究回顧

過去在香港和臺灣的報章、雜誌、傳媒，有許多有關調景嶺的報導，尤其是在兩個時間點：(1) 1961 年，英殖民政府將調景嶺難民營劃歸成「徙置區」

²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二十年紀念專集》(臺北：編者，1970)，頁 17-18。

(resettlement area)、納入正常行政管理體系的時候；(2) 1992-1996 年，調景嶺村拆除計畫實施之前，居民和政府對立抗爭之時。³ 臺灣的救總和其在香港的代理機構、學校，歷年來的出版品中也有非常多關於調景嶺的報告、回顧錄等。⁴ 1997 年調景嶺步入歷史之後，臺灣國史館出版的《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和 Alan Wai-lun Yu 在英國萊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的碩士論文“The Clearance of Rennie’s Mill Squatter Area”應該是最早關於調景嶺的學術著作。《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由曾經在臺灣國立政治大學任教的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胡春惠教授主筆，主要是透過六位受訪者的口述，來呈現調景嶺的歷史發展。受訪者所提供的豐富生命經歷，充分的反映嶺民日常生活情形，為後續的研究者，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口述史料。⁵ 除此之外，該書同時也提供了其他許多重要的文獻史料。⁶ Alan Wai-lun Yu 的論文則從公共秩序管理的角度出發，以大量的媒體報導作為素材，尤其是居民的證言，同時借用歐美學界研究城市社群動亂的 Flash Point Model，⁷ 來探討 1990 年代，調景嶺清拆時，居民和香港政府抗爭的過程與結果。

³ 戰後初期，臺灣的《中央日報》不時出現為調景嶺和港澳難胞募款的呼籲和徵信錄。國民黨在港的喉舌《香港時報》和立場明顯偏向臺灣的《工商日報》、《真報》等也常針對調景嶺難民營作專題報導。1961 年殖民政府強制接管難民營，將之改為徙置區 (調景嶺村) 時，曾遭調景嶺居民集體抗爭，香港各大報當時都作了詳盡的報導。詳見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以下簡稱「PROHK」)，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中的剪報收集。1990 年代初，政府公布調景嶺村因將軍澳地區整體發展計畫而須全面清拆時，嶺民又再度組織抗爭運動，甚至與政府對簿公堂，再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成為媒體注目的焦點。

⁴ 這些包括了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一年來之救災工作》(臺北：編者，1951)；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臺北：震聲文化出版社，1958)；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香港：編者，1959)；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臺北：編者，1960)；香港調景嶺中學編，《嶺中十年》(香港：編者，1960)；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二十年紀念專集》；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濟年報》(臺北：編者，1953)；中國災胞救助總會，《調景嶺回顧錄》(臺北：編者，1993)；王國儀，《調景嶺滄桑五十年》(臺北：中華救助總會，2008) 等等。

⁵ 胡春惠教授還有一篇後續的論文，論述的主軸建立在 1997 年的研究成果上。請參見胡春惠，〈香港調景嶺營的出現與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收於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0)，頁 533-548。

⁶ 請參見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1997)，頁 267-290。

⁷ 詳見 Wai-lun Yu, Alan, *The Clearance of Rennie’s Mill Squatter Area*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1997), pp. 53-81.

緊接在這兩個研究之後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劉義章教授和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關之英教授合著的〈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該文把審視的重點，放在調景嶺內幾所主要學校的發展。劉、關二教授指出，有幾個重要的因素造就了調景嶺在 1960、1970 年代，異於香港其他地區，特別發達的文化教育事業：居民本身對教育所抱持的理念、臺灣救總與外國教會團體透過難民救濟的方式在經濟上的支援、香港教育機構整體上的不足導致嶺外學生大量入學等等。此文篇幅略為簡短，且在史料收集和整體論述上也稍欠深度。但就另一方面來說，該文不但為調景嶺內教育的研究開了先河，更是第一份，使用香港政府歷史檔案館中有關調景嶺的文件作研究，有新發現的學術著作。⁸ 劉義章教授後來轉向研究嶺內西方傳教士的慈善救助和醫療工作，尤其著重在「挪威信義差會」(Norwegian Lutheran Mission) 女傳教士司務道 (Annie Skau Berntsen, 1911-1992)⁹ 所建立的「靈實肺病療養院」(Haven of Hope Tuberculosis Sanatorium) 和調景嶺／將軍澳社區發展的關係，有較深入的研究。¹⁰

劉教授並非唯一注意到傳教士在調景嶺的救濟和文教工作之學者，香港學界知名的基督教會史家、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麟的《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是目前關於這個研究主題，最具代表性的專著。¹¹ 該書收集運用了

⁸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中，有關調景嶺的資料相當的多，存放在不同的檔案夾中。劉義章和關之英在 1998 年時只參考利用了兩個檔案夾。其中的一個檔案夾中的文件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 1950-1957*) 對調景嶺營成立的前因後果，相對於之前一般的說法 (秧歌舞事件)，提供了不同的詮釋。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史藪》3 (1998 年 12 月)，頁 358-359、375。

⁹ 司務道出生於挪威，1938 年底赴中國陝西省南部基督教內地會、挪威協同差會根據地商縣、龍駒寨等地工作，直到二次大戰結束返國省親。雖然她在 1947 年回到教會陝南根據地繼續工作，但在 1951 年卻和大部分的西方宣教士一起被迫離開共產中國。司務道 1953 年再度來到亞洲服務，到香港調景嶺從事濟貧和各項醫療工作，活人無數。基於調景嶺醫療服務機構的匱乏，司務道在 1955 年創立靈實肺病療養院 (後來的將軍澳靈實醫院)，出任護士長。除了醫療服務之外，司務道後來也負責挪威聖約翰教會在港的業務，參與建立學校與發展文教事業等工作，直到 1977 年退休返國為止，司務道將其後半生奉獻給調景嶺和將軍澳地區。請參見 Gene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陝西聆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1983); 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荒原上：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二》(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1985); 戴樂群等編著，《靈實醫院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1995)。

¹⁰ 劉義章，〈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頁 113-129; 劉義章，《盼望之灣：靈實建基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5)。

¹¹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0)。

大量的教會史料，分別就不同的教派與組織在調景嶺的福音傳播、社會救濟、醫療服務、學校教育、人才培訓等各層面，進行深入的討論，也分析了教會在 1960 年代的調景嶺沒落的原因。在訪談方面則包括了二十五位曾經上教會的調景嶺居民和曾在調景嶺服務的傳教士的證言，其中有許多不同於殖民政府官方及臺灣救總的論述。梁教授後續有關調景嶺的研究則投注在信徒人數最多的「宣道會」（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Church Union）。在 2002 年出版的另一篇專著中，梁家麟在全面地檢閱了香港和美國宣道會的史料後，對自己稍早在《福音與麵包》中提出的論點，提出了部分的修正。¹²

近年來，調景嶺的研究在兩位年輕歷史學者的努力之下，有了許多突破性的發展。香港大學藍安偉（Kenneth On Wai Lan）¹³ 的博士論文“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是到目前為止，對調景嶺的起源、發展和結束的歷史進程，不論在敘事分析或是史料收集上，都是最全面且最具系統性的著作。該文整理、參閱了為數眾多的文獻，其中包括了：以《香港時報》為首的，十四份戰後在港發行的報紙、美國國家安全會資料（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東華醫院檔案、加拿大聯合教會檔案（United Church of Canada / Victoria University Archives）、英國國家檔案（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以及香港殖民政府的各式公文資料。其中最精華的部分，就屬塵封在香港政府歷史檔案館中，大量還未被發掘及利用的調景嶺文件。¹⁴ 另外，除了參訪調景嶺居民外，藍安偉也透過他曾經擔任公職的父親，找到了當年參與調景事務的英殖民政府官員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訪談，為官方公文中記載的政策討論、立法程序、人口數據等提供有力人證，作為建立歷史論述的重要依據。¹⁵ 建立在辛勤的蒐證工作上，藍安偉將調景嶺的形成和變遷，置於香港在冷戰中的國際外交、難民救助、殖民治理、公共政策規劃等議題下，作嚴謹而深入的討論。

¹² 梁家麟，〈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頁 146。

¹³ 藍安偉現已至北京師範大學與香港浸信會大學合辦的聯合國際學院任教。

¹⁴ 前面已經提到，劉義章和關之英 1998 年的論文是第一份參見香港政府歷史檔案館中有關調景嶺的文件之學術著作。但是劉關二教授只有利用其中兩個檔案夾中的文獻，對其他大部分的資料未作詳細的分析。

¹⁵ 詳見 Kenneth On Wai Lan (藍安偉),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p. ii.

不讓香港年輕學者專美於前，臺灣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林芝諺在其碩士論文〈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中，以人道救援和國際政治史的觀點，透過 1950 年代救總對調景嶺難民的援助，分析討論了國府難民救助及入境政策的形成和執行成效。同時也針對，港澳的難民議題的「國際化」——其如何成為國府敗戰遷臺後，在冷戰的國際舞台上，維持中國代表權正統性，重新凝聚海內外力量的反共宣傳工具，因此造成了政治利益高於人道精神，宣傳大於實質援助等情形。該文運用的史料也相當豐富，以臺灣方面的資料為主，包括為數眾多的官方文獻（〈外交部檔案〉、〈立法院會議速紀錄〉等）、救總出版品、報紙、期刊雜誌。在林芝諺收集的第一手資料中，最具參考價值的，應該是 1950 年代早期的〈中央改造委員會會議記錄〉和香港第三勢力雜誌《中國之聲》。¹⁶ 該論文後半部敘述香港難民問題「國際化」的部分，雖然在英文資料收證上稍顯不足，尤其是美、英政府和香港政府當局在當時對香港難民問題都有很龐大的第一手資料，但總的來說，該論文本身結構嚴謹、分析獨到，實為佳作。

三、理論、方法學、史料概述

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將嘗試以現今國際移民研究中「流亡／離散」（diaspora）中的理論，來檢視調景嶺這個被稱為「小臺灣」和「海外反共精神堡壘」的社群，在時空中的變遷、歷史意義以及和臺灣的關係。到底這樣一個在香港，表面上看起來和當地社會格格不入的「國民黨村」是如何形成的？國府在情勢比較穩定之後，為什麼不將這區區一、兩萬死忠支持者接到臺灣，而要救總繼續以難民援助的方式接濟？還有，這個也是因為內戰中，逃避共產黨壓迫而離開中國大陸的海外流亡群體，又可以給臺灣的外省人研究帶來什

¹⁶ 請參見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筆者在參見林芝諺的論文之前，已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發現，戰後早期香港第三勢力雜誌如《自由陣線》、《中國之聲》中，有許多在調景嶺難民營成立之初，因批評國民黨被營中的自治機構指為「左派」或「第三勢力分子」，趕出調景嶺的軍民所寫的投書，其中有不少對難民營中黑暗面的描寫。

麼樣的啟發？當共產中國興起時，有幾百萬人同時逃到臺灣和香港。當時許多人認為，流亡只是暫時性的，他們將在幾年之內重返大陸，但是這個願景卻隨著時空的流轉而消逝。在不同的歷史情境發展下，逃到香港的人被視為是「難民」(refugees)，他們的子孫成為「香港人」(Hong Konger)，而到臺灣的移民則伴隨著一個專制政權流亡，在島內戰後歷史的演進下，成為所謂的「外省人」族群。本研究試圖將 1949 大遷徙的歷史，放在一個更為寬廣的跨界比較框架中，就最廣義的層面上來說，這篇論文是對目前國際學界「中國移民研究」(The Study of Chinese Migration) 中，政治性移民研究貧乏的一個批判，也是對臺灣外省人研究中，近年來出現的「流亡／離散」(diaspora) 理論的一個回應。這一些論點在最後的總結中，將有更詳細的說明。

以下對香港調景嶺的起源和歷史發展的論述，除了參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之外，主要的史料來自「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中所收藏的調景嶺文件和「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特藏微縮膠捲」(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icrofilm) 中英國「殖民部」(Colonial Office) 的檔案。其中，前者所藏的調景嶺文獻非常的豐富，除了為數甚鉅的政府公文、報告書、機密情資、通訊錄之外，還有民間企業收據、教會慈善機構的請款單和大量的剪報收集。在另外一方面，筆者也參閱了許多臺灣救總出版的主要刊物，如《救總十年》、《救濟年報》等。

過去國府和英殖民政府因為不同的政治利益與國際關係考量，無可避免的，對調景嶺社群，乃至於對所謂香港「中國難民」問題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如前述，國府和救總的說法是，香港所有的戰後移民都是逃避共產暴政的「政治難民」，而調景嶺為：「我忠貞難胞集居之地，反共精神極為堅強，是港九二百萬流亡難胞團結的中心。」¹⁷ 很顯然的，救總的論述為反共文宣和國民黨國家主義之產物，與事實不符，早期的調景嶺難民營和香港其他廣東華人社群不同，與其說這個地方是一個港九二百萬同胞團結的中心，不如說這是一個因港府隔離政策、居民語言、政治屬性和本地格格不入，被香港主流社會邊緣化的群體。在另一方面，根據香港政府在 1950 年代早期的說法，香港沒有「難民問題」(refugee

¹⁷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二十年紀念專集》，頁 17-18。

problem) 只有「暫居者」(squatters)。這當然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從大陸進入香港的中國難民、勞工、商人等都只是暫居，整個殖民地的流動人口比例非常的高，所以殖民政府用過去的經驗來衡量當時的情形。另一個比較實際的原因是，港府一旦承認了這幾百萬的戰後移民是「難民」，政府就有某種程度的責任和義務要照顧他們。¹⁸ 至於調景嶺，因考慮到和共產中國發展友好關係，英方一直欲去之而後快。但在這裡筆者認為，雖然兩方立場皆有偏頗，但英殖民政府站在主政者的位置，實際上負起了管理的責任（雖然萬分不情願），再加上對國民黨在香港的勢力發展和諜報工作一直有很大的戒心，因此對調景嶺的管理監督與情資收集十分用心。所以，英官方文獻如社會局檔案、警務處資料、部會間的通訊錄、部會首長會議紀錄等，有許多可以反映過去調景嶺內部之情形。而救總歷年來的出版刊物當然也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資訊。這些文獻，形塑了目前臺灣社會對調景嶺的了解。但救總出版品同時也帶有強烈的反共文宣，論述單一，意識形態明顯，影響了其對資料的選擇和詮釋，所以研究者在引用時需特別注意。¹⁹

除了香港殖民政府的文獻和臺灣救總刊物之外，筆者也參閱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中所收藏，1950 年代第三勢力在香港發行的兩份主要雜誌《自由陣線》與《中國之聲》。所謂的「第三勢力」就是不屬於國共兩黨的組織和黨派，其中有保守的新儒家學者、自由主義分子、社會主義支持者、也有失意的政客與軍閥，成分相當複雜，也沒有統一的領導。有一部分在內戰的政治協商決裂後，加入共產黨的陣營，成為中共的「民主人士」；有些則跟隨國民黨到臺灣，在 1950、1960 年代的地方選舉和以雷震《自由中國》雜誌為中心，對曇花一現的反對黨籌組運動頗有貢獻。²⁰ 另外一大部分則堅持反共、批蔣的立場，在海外高舉反專制獨裁、擁護中華民國自由憲政體制的旗幟。在 1950 年代，這些流亡知識分子以香港為主要基地，在美國政府和流亡美國的桂系將領李宗仁的暗中支持下，發行政論雜

¹⁸ 根據加拿大歷史學者 Glen Peterson 最近的研究發現，當時的港督葛量洪曾要求刪除聯合國香港中國難民報告書中，有關在地救濟和安置的可能性評估。由此，戰後早期英殖民政府對難民問題的態度可見一斑。Glen Peterson, "To Be or Not to Be a Refug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Hong Kong Refugee Crisis, 1949-55," *The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2 (June 2008), pp. 171-195.

¹⁹ 參考了許多救總文獻的林芝諤似乎也有同感。請見，林芝諤〈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 3。

²⁰ 請參見陳正茂，〈滄桑五十年：記民社黨在臺灣〉，《傳記文學》91: 6 (2007 年 12 月)，頁 34-51。

誌、進行諜報工作，在當地有不少的支持者，²¹ 被國共兩黨視為眼中釘。其中勢力較大的有張君勱領導的「中國民主社會黨」與左舜生、曾琦、李璜等主導的「中國青年黨」。²² 《自由陣線》早期的負責人是左舜生，而《中國之聲》的主導者為顧孟餘、張發奎、伍憲子、張國燾等人。《中國之聲》因為經費不足，只有短短兩年的歷史（1951-1952），但是《自由陣線》則在港發行十年之久（1949-1959），是所有第三勢力中發刊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一份政論雜誌。²³ 筆者在港大圖書館檢閱這兩份雜誌時發現，在 1950 年代早期的「讀者投書」中，投書者很多都是住在（或曾住）調景嶺難民營的人，其中有許多關於營中黑暗面的描寫。這些投書內容清楚顯示出，國府如何在救濟的名義下，利用特務、同鄉會、同學會等組織，在營中發展勢力、清除異己。當時有非常多人想去臺灣，但是國府對於入境的管制和審核非常的嚴苛，若在臺灣無有權有勢之人幫忙，又沒有錢打通關節，多無法如願。多數人到不了臺灣也得不到實質救助，最後失望離開。有一些則因發牢騷批評時政，被指控為「第三勢力分子」而被趕出難民營。這些情形對救總刊物中所塑造的「忠貞義民」，提供了另一幅不同的圖像。

另外筆者也參考早期在難民營中發行的《營報》，還有香港總督葛量洪爵士（Alexander Grantham, 1899-1978；任期：1947-1957）以及挪威信義會女傳教士司務道等的回憶錄等。在口述歷史方面則仰賴前一節文獻回顧中提到的國史館《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中部分的證言。筆者於 2009 年 10、11 月間赴香港收集資料時，曾到調景嶺多次，試圖尋找訪談者。但卻因時間有限且缺乏在地之引見人等因素而作罷。昔日偏僻封閉的社區，因大規模填海、營建工程而完全改觀，今天已成為高樓林立的新市鎮。嶺上原本櫛比鱗次的小屋被防治土石流的水泥工

²¹ 根據香港政府的一份內部報告，50 年代早期香港第三勢力成員和支持者加起來約有 2 萬人左右。詳見 G. W. Aldington to E.T. Biggs, (August 5, 1953),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icrofilm (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特藏微縮膠捲，以下簡稱「HKULSCM」)，CO 1023/101, *Kuomintang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52-1953*, pp. 26-27。

²² 詳見 Tianshi Yang, Wong Young-tsu trans.,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1950s,” in Roger B. Jeans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2), pp. 269-273；薛化元，〈張君勱與「自由中國」政府（1949-1969）：以「第三勢力」論為中心的考察〉，《臺灣風物》44: 4（1994 年 12 月），頁 61-96；陳正茂，〈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

²³ 陳正茂，〈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歷史料之介紹與略評〉，《傳記文學》92: 6（2008 年 6 月），頁 60-63。

事取代，山頂上鐫刻的「中華民國萬歲、擁護蔣總統」等大字標語被移除。²⁴ 調景嶺村在 1996 年完全拆除之時，街坊自治團體服務處解散，全體居民被迫遷移到政府其他的公屋區，有一部分住進將軍澳的厚德邨，過著和以前一樣守望互助的生活。1997 年回歸中國後，這些人多不願輕易表明身分，如無良好的在地網絡，外來研究者在尋找訪談對象時，會遭遇到許多困難。筆者曾到救總在香港的「中國文化協會」²⁵ 詢問，協會的工作者告知，遷居厚德邨的居民在香港主權回歸中國之後，因為政治敏感，很多都不願再談調景嶺的事。²⁶ 這些碩果僅存的早期居民，已從反共流亡的難民，成為道地的香港人，在被迫搬遷之後，將過去國仇家恨的歷史情感，化作對調景嶺這個地方的共同追憶。事過境遷，這個獨特的社群，當年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四、調景嶺的起源

1949 年下半，國共在大陸上的生死戰進入尾聲。1949 年 10 月，人民解放軍攻佔廣州，香港湧入大量的難民，除了純粹為逃避戰禍而來的普通老百姓（大多為廣東省農民），難民群中夾雜不少國民黨殘軍以與國府的政、警、教、工各界人士，其中不乏在大陸地位顯赫的將校、地方首長、國大代表等。到了香港之後，很多人過著露宿街頭、居無定所、三餐不繼的生活。²⁷ 在當時，短期內能受到臺灣及海外親友援助而離開香港的人，算是比較幸運的少數。而無海外親友援助、非廣東人或是沒有在在地人脈關係之難民，境況則相當淒慘。²⁸ 根據香港政府歷史

²⁴ 這些標語是在 50 年代後期刻上去的，救總有許多當時的照片。詳見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5。

²⁵ 「中國文化協會」的前身為「援助港澳自由文化人士委員會」。救總在 1956 年，為了救助逃港的知識分子，在香港成立這個文教機構。詳見香港中國文化協會編，《文協十年，1962-1971》（香港：編者，出版年不詳）。

²⁶ 調景嶺在 1995 年 4 月正式動工拆除，工程於一年後完成。當時約有幾千名居民獲安置，入住政府公屋，當中有一部分的人往東遷入將軍澳厚德邨（村）的高樓公寓。在社區清拆之前，救總的調景嶺中學，已先行遷移到將軍澳的康盛花園，改名為「景嶺書院」，由香港政府接手。而和嶺中歷史同樣悠久的教會學校，天主教鳴遠中學及信義會慕德中學等也一併遷往厚德邨。筆者在港期間造訪了這些地方，同時見到了景嶺書院的前任校長張世傑，但因時間關係，無法作正式的訪談。

²⁷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1。

²⁸ 當時曾有兩部暢銷小說，其內容充分反映出戰後初期香港政治難民貧困交加、妻離子散之苦。詳見趙茲蕃，《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1953）；張一帆，《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1954）。

檔案館所藏「社會局」(Social Welfare Office)²⁹ 相關文件, 1949年11月8日, 148名國民黨落難軍人以及他們的家人, 受到好心的香港警察指引帶路, 至有名的私人慈善機構「東華醫院」³⁰ 求助, 得到收容照顧。消息傳開之後, 散落在港澳各處的國民黨殘軍及黨、政人士, 如潮水般湧來。社會局報告顯示, 1949年11月底,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東華醫院登記求助的難民已經超過1,800人, 12月底更達3,000名。其後人群不斷的聚集, 就地搭營居住, 將東華醫院附近街道圍得水洩不通。³¹

由於難民人數太多, 東華醫院無法容納遂與英殖民政府洽談, 於是港府社會局開始介入。1950年3月28日當天, 東華醫院在社會局、警察機關, 以及其他政府單位的協助下, 將難民轉移至鄰近「摩星嶺」(Mount Davis)³² 較偏僻的山邊一帶安置。當時難民人數已達到4,000人, 4月時則又增加到5,000人左右。³³ 搬到摩星嶺後, 東華醫院仍繼續提供食物、醫療救濟, 以及負責辦理遣送難民至臺灣或海南島等事宜, 港政府則以「事後請款」(reimbursement) 的方式來資助東華醫院。³⁴ 從現存的東華醫院請款單來看, 港府當時分期支付東華醫院救濟國民黨難民的金額, 超過50萬港幣(其中有一大部分是由警察基金支付), 其數目遠

²⁹ 社會局為「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前身, 1948年成立時附屬於「華民政務司」(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 主要是港府為了解決內戰和1950年後逃港中國難民的救濟、安置等問題, 在原有的華民政務司之下所成立的機構。該局1958年成為獨立的部門。

³⁰ 東華醫院(「廣東華人醫院」的簡稱)成立於1869年, 為香港歷史上由華人富商捐建及管理的第一個大規模慈善醫療機構。1930年代和廣華醫院及東華東院合併後通稱「東華三院」。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 贊助和掌控東華的富商, 成為居港華人權力的核心, 當時英殖民政府在處理華民事務時, 經常諮詢東華醫院。因此, 這個慈善機構在居港華人群眾、港政府、中國政府以及東南亞華人群體之間扮演了舉足輕重之聯繫、斡旋、糾紛調解等角色。該機構在二次大戰後漸漸失去政治影響力, 但在慈善、醫療、及文教事業上則持續其重大的貢獻。詳見Elizabeth Sinn(洗玉儀),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洗玉儀、劉潤和編, 《益善行道: 東華三院135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 三聯書店, 2006)。

³¹ 詳見“Summary of the Lo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Problem of Refugee Nationalist ex-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p. 1:1-1:2.

³² 摩星嶺位於香港島西隅, 形勢顯要。嶺上建有要塞(Jubilee Fort), 為屏障港島西側的軍事要地。1941年香港淪陷, 駐港英軍向日軍投降後荒廢, 人煙稀少。

³³ “Summary of the Lo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Problem of Refugee Nationalist ex-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 1:2.

³⁴ “Departmental Report for the First Four Years, 1 April 1948-31 March 1952,” HKULSCM, CO 1023/126, *Social Welfare Report Hong Kong, 1952-1954*, p. 44.

超過民間企業慈善捐款。³⁵ 根據東華醫院的紀錄，在該院將難民正式交付與社會局遷移到調景嶺之前(1950年6月底)，登記總人數達8,000餘人³⁶ (其中約3,000名已遣返至臺灣或海南島)。³⁷ 但是這些並不包括沒有到醫院正式登記的人數。事實上，為了防止更多的難民繼續聞風而來，在1950年初，東華醫院先是縮減難民的每日配給，維持只能勉強存活的程度，然後在難民遷至摩星嶺後，不再接受新的登記申請，把發放飯票人數限制在原有的4,000個名額。³⁸ 但這些措施並沒有使摩星嶺的難民數字減少，新來的民眾被東華醫院拒絕後，自行前往摩星嶺，用撿拾而來的材料搭建簡陋的帳篷或木屋棲身。因此，在移動到調景嶺之前，聚集在摩星嶺的難民，實際數字可能超過一萬人。³⁹ 但這一萬人只是香港戰後難民危機中的滄海一粟。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因國共內戰、大陸政權易手所產生的「難民危機」到底有多嚴重呢？根據1954年到香港調查中國難民問題的「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漢布茹博士 (Edvard Hambro, 1911-1977) 的報告，1945年8月太平洋戰爭結束時，香港總人口只有60萬左右。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香港(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之前，因為湧進了大量逃避中日戰爭的老百姓，以及來自京滬杭的富商群、專業人士，其總人口數曾經超過百萬(約164萬)。⁴⁰ 但在日本占領期間，因軍政府嚴苛的糧食徵收、

³⁵ 有關東華醫院請款單據部分，請見 PROHK, HKRS41-1-5240, *Destitute Nationalist Soldiers-Maintenance and Reparation of...and Their Dependents, 1949-1950*, pp. 1-18。有關同時期民間捐款的討論，請參見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76-78.

³⁶ 也有另一個調查報告說是登記了7,000人。王裕凱研究指導、陳勃等研究報告，《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1960)，頁16。

³⁷ 胡春惠教授在參考了東華醫院的紀錄後認為，在摩星嶺時期約有2,000人被遣返至海南島或臺灣。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14。但根據社會局當時的報告，人數顯然應在3,000人以上。

³⁸ "Summary of the Lo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the Problem of Refugee Nationalist ex-Soldiers and Their Families,"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p. 1:1-1:2。藍安偉教授對此的解讀，認為東華醫院如同港府一般，也希望這些政治敏感度高的難民能快一點解散，或是早日被遣返。他在論文中對東華醫院當局的作法造成難民問題的擴大一說，提出反駁。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 79.

³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13-15。

⁴⁰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Holland: A.W. Sijthoff-Leyden, 1955), p. 13.

強制性移民政策，以及戰時統制經濟，造成港口商務停滯、物資缺乏、經濟蕭條，使得人口大幅縮減。⁴¹ 因此，1945年8月戰爭結束時，香港總人口只有50-60萬左右。但在戰後立即出現大量回流潮，短短幾個月間就高達數十萬人，再加上中國大陸國共戰爭全面爆發，使得到港人數持續增加，居民總數超過百萬。1947年初達140萬；1948年初已有約180萬。1949年4月，人民解放軍渡長江，大舉南下，10月占領廣州，大批難民越過邊境逃入香港，整個港九地區人口數一夕之間爆增，1950年初總人口曾達230萬人之多。⁴²

很顯然的，逃到香港的幾百萬難民並非全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反共的政治流亡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去臺灣。因為在1950年初，尤其是韓戰爆發前，臺灣的情勢也很不穩定。從漢布茹之報告數據來看，當時應該有一部分的難民（約20萬）在內戰結束後一年間返回大陸。⁴³ 這些人多為鄰近的廣東省居民，到香港純粹只為躲避戰禍。研究1950年代調景嶺內教會救濟、文教活動的梁家麟認為，1949年之後遷港的人士，大致上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國內資本家與政界人士，第二類是國民黨中下級官兵，第三類是華南（廣東省）的農民，而戰後移入香港人數以第三類為主。筆者發掘的一份社會局調查報告可以證實這樣的說法。1952年7月至9月間，港府社會局對當時大批露宿街頭及搭木屋帳棚的「暫居者」，進行了戰後第一次大規模的調查，三個月中訪談人數共達7萬人。這次的調查顯示，在7萬人中，戰後移民人數約佔80%，而其中90%為廣東省人。⁴⁴ 總體來說，雖然當時香港居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戰後移民，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人，但他們大多不關心左派、右派的鬥爭，寧願在英國統治之下，尋求暫時的安定。⁴⁵

⁴¹ 關於日本占領下的香港，請參見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⁴²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 144, Table IV.

⁴³ Edvard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p. 144, Table IV.

⁴⁴ “Quarterly Report for the Three Months, 1 July to 30 September,” HKULSCM, CO 1023/126, *Social Welfare Report Hong Kong, 1952-1954*, p. 76.

⁴⁵ 英殖民政府的報告中清楚表達了這樣的觀點。請參見“Colonial Secretariat of Hong Kong to Colonial Office London, (November 16, 1954),” HKULSCM, CO 1030/326, *Political Allegiance of Hong Kong Citizens, 1954*, p. 9.

1950 年代早期流亡香港的國民黨支持者究竟有多人？這樣的人有多少到了摩星嶺？他們都想去臺灣嗎？在現存的英殖民政府檔案中，有一紙在 1953 年 8 月，由香港「輔政司署」(Colonial Secretariat)⁴⁶ 發給其母國外交部（中國及韓國司）的密函。其中對「國民黨支持者」(K.M.T. supporters) 在香港的人數有大致上的評估。根據這個情資，在 1950 年代香港約 200 多萬的居民中，可以稱上是「國民黨支持者／同情者」的人，最多只有約 14-16 萬左右，還佔不到總人口的一成。⁴⁷ 碰巧的是，這個數字和救總於 1952 年委託調景嶺難民自治辦公室調查登記的「流亡港九難胞」人數（14 萬）是非常相近的。⁴⁸ 很顯然的，當時這十幾萬人並沒有都全部聚集到摩星嶺，有一些在香港有財力、有在地親朋的人可能想先待下來，看看情形再說，而在臺灣主政者高層中有關係的，則有管道可離港，入境到臺灣。

當時群聚到摩星嶺都是什麼樣的人呢？曾經當選調景嶺區議員，在 1990 年代帶領居民向港政府抗爭的王國儀回憶：

當時摩星嶺住的，大多是外省人，公教人員居多，不會講廣東話。還有許多軍人，他們在進入香港時才被迫脫下軍服、繳交軍械武器。他們集中在摩星嶺，第一是語言能溝通；第二是東華三院每天固定給一頓米飯或稀飯吃。他們每天排隊領飯，暫時住在那兒，每天人來人往。有的人住幾天就離開，出去工作或找親友去了。可是有些人過陣子又回來，當然也不斷地有新難民加入。⁴⁹

很明顯的，1950 年聚集到摩星嶺的人，大多是在本地沒有親友或出路的人，且大多為非廣東籍的中、下階級軍、公、教人士。他們除了接受救濟，滿足生活上直

⁴⁶ 輔政司署是香港殖民政府推行政務的主要機構，其功能類似臺灣的行政院，輔政司長為港督的副手，早期通稱「殖民地司署」，1976 年後改名為「布政司署」(Government Secretariat)。

⁴⁷ 這個估算中包括了約 2 萬的第三勢力分子，所以比較精確的數字應為 12-14 萬左右。許多支持第三勢力的人因反共理念也想去臺灣，所以他們會向國民黨在港的機構登記。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份情報的草擬人 G. W. Aldington 對自己的估算並沒有太大的自信，但他提供的數字卻和國民黨黨部當時未公開的登記資料相近，顯示英人在情報工作上的效率。報告全文見“G. W. Aldington to E. T. Biggs, (August 5, 1953),” HKULSCM, CO 1023/101, *HK Kuomintang Activities*, pp. 26-27.

⁴⁸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 (1950-1961)〉，頁 273-274。

⁴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07。

接的需求之外，大部分都不打算待在香港，而期望短期內能去臺灣尋求新發展，這是他們和其他戰後從中國大陸到香港的人，最不一樣的地方。梁家麟提到：

當時期，社會上廣泛流傳一個說法：惟有到摩星嶺「報到」，取得並維持難民身分的人，才有機會為臺灣當局核實，接納遷臺。故不少新移民無論是較後來港，或較早來港而棲居別處的，也紛紛轉到摩星嶺，加入難民的行列，這與政府原來期望他們自行散去的想法，可謂南轅北轍。⁵⁰

對於內戰時與內戰結束後抵港的大批中國難民，香港殖民政府早期採取放任不理的態度。⁵¹ 當時的港督葛量洪在回憶錄中坦承，他與香港大部分的官員都是在 1953 年末發生「石峽尾大火」⁵² 的慘劇之後，才開始認真思考，如何解決龐大群眾的居住和生計問題。這些戰後抵港的民眾和戰前暫時進入香港避難、作生意、打零工的人不同，他們大多會住下來。⁵³ 但是和一般來自廣東省的難民比較起來，港府對 1950 年聚集在摩星嶺的國民黨支持者則有很大的戒心，因為雖然其人數和一般難民比起來相對較少，但政治意識形態鮮明，許多人又曾是士兵，可能會被國府、美方等利用，損害英國盡力維持的中立形象與其在港權益。英國是西方民主陣營中少數首先承認中共的國家，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要繼續維持在香港的地位。⁵⁴ 葛量洪於回憶錄中提到流亡在港之國民黨殘軍時說：「他

⁵⁰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 36。

⁵¹ 這可以從 1950 年 4 月香港「天主堂」(Catholic Mission) 的主教們，對如何解決難民問題，向殖民政府提出一些具體建議，而港府透過「華民政務司」堅定的回絕這些提議的情形中看出來。PROHK, HKRS41-1-6141, *Refugees-Suggestion Regarding Possible Way to Help.... in the Colony, 1950*, pp. 1-3.

⁵² 1953 年聖誕節前夕，戰後移民聚集的香港九龍石峽尾木屋區發生嚴重火災，因為建築物雜亂密集、無道路、防火規劃等因素，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燒掉十幾萬平方呎的建築物，超過 5 萬多名受災戶無家可歸，震動國際視聽。研究戰後香港的學者大都認為，這場大火是港府公共福利政策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捩點。大火過後，為了安置災民，政府改變了以往放任不管的態度，成立了「徙置事務處」(Resettlement Department) 來規劃重建事宜。此舉直接促成了香港公共房屋政策的誕生，不但造就了今日「公屋大廈」林立的奇景，也為後來由政府主導、有效率的城市規劃以及良好的社會福利機制，奠定了基礎。徙置事務處在 1973 年改組成為「房屋署」(Housing Department) 延續至今。近幾年來，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強調港府在大火後並非馬上決定介入，公屋政策的發展背後還有其複雜性，尤其是政治因素。請參見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⁵³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53-159.

⁵⁴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36-44.

們是一個大麻煩，而且是一個代價很高的（麻煩），是我們和中國政府關係的阻礙，特別是當有一些人組織反北京運動。」⁵⁵ 所以，港政府表面上不直接介入，透過民間慈善團體東華醫院來救助這些人，原意是要將親國民黨的難民們集中送出香港，但是遣返工作卻一直無法順利進行。根據社會局資料顯示，東華醫院最大的兩批遣返，是 1950 年 1 月、2 月間前往臺灣和海南島（共約 2,600 人），花費全由香港政府承擔。但這樣大規模的遣返在 1950 年 3 月後就停止了，之後的遣返每次都只有數百人。⁵⁶

根據現有的資料，臺灣方面的阻力是遣返工作遲緩的主要原因。1950 年 1 月 30 日東華醫院將近 1,000 名難民送到海南島，⁵⁷ 但其中約 100 人被原船遣返，理由是他們身分證明文件有問題。但是葛量洪在給英國淡水領事館的電報中卻批露，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 100 多人都是瞎眼、肢體殘障的難胞。同年 2 月，另一批約 1,000 名傷殘難民抵臺，臺灣方面只收了 34 人（非傷殘者），其他的預定要再被送回香港，後來在香港政府的強烈抗議之下，國府勉強收容了約 500 人。遣送臺灣的工作碰釘子後，港府也和中共外交部商談，嘗試將一些人送到北方羅湖邊境遣返回大陸，但中共當局以這些人是「國特」為理由，拒絕他們入境。⁵⁸ 由於這些人都想去臺灣而不想被送回大陸，且多為國民黨殘軍，葛量洪對臺灣方面的作法十分不諒解，他在回憶錄中寫到：

（國府）拒絕這些人的理由是，這其中可能有匪諜。但臺灣像這樣的人（來自大陸的流亡者）已經很多了，所以我認為這非常缺乏說服力。真正的理由應該是，如果這些人留在香港，中華民國政府就不需為他們的生計負責。我在紐約碰到出席聯合國會議的國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時候，當面問過他，他也承認這點。⁵⁹（筆者譯）

⁵⁵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p. 141.

⁵⁶ “Summary of the Local Historical Background,”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 1:1.

⁵⁷ 海南島是 1950 年 5 月才被共軍占領。

⁵⁸ 這一些情資來自殖民地檔案中港督和英國駐臺灣淡水領事館的通訊錄 CO537/6314。詳見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82-86.

⁵⁹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p. 141.

遣返工作進行遲緩之下，社會局和東華醫院縮減難民每日配給，維持只能勉強存活的程度，然後在難民遷至摩星嶺後，不再接受新的登記申請，把發放飯票人數限制在原有的 4,000 人，希望難民能自行解散。但如前面所提到的，這些措施並沒有使難民人數減少。

既然香港當局希望這些代價很高的「大麻煩」趕快去臺灣，或是就地解散，融入一般的群眾，港府社會局為何要在 1950 年 6 月 26 日，在短短兩、三天內，將暫時聚集在摩星嶺的難民 5,900 人，以渡輪載到對岸九龍半島「魔鬼山」(Devil's Peak) 東麓的調景嶺呢？⁶⁰ 既然希望這些政治敏感度高的難民能散去，為什麼要替他們特別成立一個難民營呢？按照一般的說法，起因為 1950 年 6 月 18 日發生的「秧歌舞事件」(或六一八事件)。事件發生當天，有一群親左派工會的職工和學生約 60-80 人要到鋼線灣去郊遊野餐，途中經過摩星嶺難民聚集的地方時，故意敲鑼打鼓並大跳「秧歌舞」，嘲諷落難在港的國民黨支持者。「秧歌舞」源自於陝北民間舞蹈，中共在延安時期將之推廣作為群眾運動的媒介，後來成為共產黨慶祝勝利的象徵。難民們見狀一時群情激憤，於是和這些親左群眾發生激烈口角，進而演變成流血衝突。香港警方聞訊趕到，分開雙方。45 位秧歌舞者及 14 名摩星嶺難民受傷，無人死亡。⁶¹ 事件發生後一個禮拜，港府就火速將難民遷移到更偏遠荒涼的調景嶺。

歷年來，國府文宣、香港親右派報紙、救總出版品，皆斷言這次的衝突是港政府把摩星嶺難民集體載運到調景嶺營的起因。⁶² 這個論述有悲壯、淒美、正義之士被迫害、放逐邊疆之感。其中還有史詩性的著作來歌詠這個歷史事件，如白家祺的《摩星嶺之役》。⁶³ 所以秧歌舞事件就成為調景嶺的「起源神話」(founding

⁶⁰ 過去的研究在運送天數和載送難民人數上有些不同的說法。筆者在綜合參考了所有說法和現有的史料後認為，官方的正式遷徙作業，只有一天(6月26日)，人數在 5,900 人左右。但是在後來的幾天中，幾千名沒有坐上政府運輸船和未經登記核准的難民則自行前往。請參見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3-19；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 26-27；劉義章、關之英，〈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頁 359-360；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114-115。

⁶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7-18；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97-98。

⁶²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頁 18。

⁶³ 白家祺，《摩星嶺之役》(臺北：黃埔出版社，1954)。

myth)。臺灣師範大學的林芝諺認為，這和事件發生之時國府透過黨報書刊刻意宣傳營造的「義民」形象有關。⁶⁴ 根據社會局檔案，早在秧歌舞事件發生兩個月前 4 月 18 日一次例行的行政會議中，港政府就已決定將摩星嶺難民遷到一個更偏僻的地方（大嶼山的梅窩），而這個草案則早在 3 月 12 日由社會局副局長韋輝（James T. Wakefield）擬定。⁶⁵ 這與遣送臺灣的工作受到阻礙的時間點大致吻合。而在其他檔案文件中，也可以看到英人已經為了這次的遷移，策劃了幾個月。摩星嶺雖處港島西隅，位置還是太靠近市中心區，而且鄰近有許多英人及華人富商的高級住宅區，這些上層階級對難民在他們住處附近四處遊蕩乞討的情形，已有許多怨言。其次，摩星嶺屬軍事要地，英國軍方當時已經行文向港政府要求歸還。⁶⁶ 所以秧歌舞事件只是難民營成立的一個「導火線事件」（trigger incident）而並非主因。至於搬遷之處為何從大嶼山的梅窩，又改為調景嶺，則是因為大嶼山的住民極力反對，而韋輝又剛好發現在九龍魔鬼山東麓有一塊面積相當大的荒廢物業是屬政府的，該物業為一個廢棄的麵粉廠。⁶⁷

調景嶺本名為「吊頸嶺」，地名源自於 1908 年時，有一個退休的加拿大籍公務員倫尼（Alfred Herbert Rennie, 1857-1908）在這裡自殺。倫尼於十九世紀末來到香港發展，曾在殖民政府中擔任要職。1900 年退休之後，決定將畢生積蓄投資在香港興建麵粉廠，為了節省成本，他決定將工廠建在偏遠地區。他用很便宜的價錢買下九龍魔鬼山東麓面臨將軍澳灣的一大片荒地，將之建設成麵粉磨坊（Rennie's Mill）。⁶⁸ 工廠在 1908 年因經營不善而倒閉，倫尼因受不了破產的打擊，用巨石綁繩子環頸，投海自殺。⁶⁹ 他的物業被銀行拍賣，土地和廠房轉手賣

⁶⁴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 23-25。

⁶⁵ “Note on Lantao Site Prepared by S.W.O” and “Executive Council Meeting of April 18, 1950,”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p. 2-3, 5. 如前述，劉義章和關之英是最先發現這些檔案文件的學者。後來藍安偉在參見香港歷史檔案館史料時，也注意到這些文件的重要性。

⁶⁶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91-92.

⁶⁷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106-108.

⁶⁸ 該地的英文名稱因這間麵粉廠而稱為 Rennie's Mill 「倫尼的磨坊」。1997 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後改用調景嶺的廣東譯音（Tiu Keng Leng）。

⁶⁹ 對於倫尼自殺的方法，各方眾說紛紜。有指他是在距麵粉廠廠址 3 公里外的鯉魚門水域跳海的，又有傳聞指他在工廠上吊自盡，也有人說其實他是被謀殺的。筆者在這裡採用胡春惠在《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中的說法。

給政府。因為離當時的港口及市區較遠，這個地方曾被港府用來作為防疫隔離地，但在 1935 年之後就完全荒廢，人煙罕至，日軍占領期間還一度成為刑場。1950 年港府決定將摩星嶺難民全體遷到這裡時，在難民群中，一時謠言四起，該地繪聲繪影的傳聞使得難民人心惶惶，怕英國人騙他們上船其實是要遣送回大陸。韋輝的華人副手李子農（C. N. Li）知道中國人有避諱的習俗，於是將地名改為同音異字的「調景嶺」（廣東語發音）。⁷⁰

1950 年 6 月底開始，港府社會局正式從東華醫院手上接收摩星嶺難民，再運到調景嶺難民營進行集中管理，同時也聯合東華醫院，發動香港其他慈善團體，如中華總商會、保良局、鐘聲慈善社等，組成「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Hong Kong's 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Relief Committee，以下簡稱「港九救委會」），想繼續借助民間的力量和資本來減輕政府的負擔。⁷¹ 當時臺灣的救總剛成立不久（1950 年 4 月），在港澳沒有據點和辦事人員，再加上英殖民政府當局對於臺灣國府官員、重要人士入境的顧忌和限制，⁷² 因此港澳主要的救濟業務都透過港九救委會來代辦。救委會主任委員剛開始是由知名富商、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卓雄來擔任。高卓雄和中華總商會對調景嶺難民營早期的工作貢獻良多，但在 1953 年，高卓雄與中華總商會因和大陸方面生意往來之需要而「傾左投共」了。⁷³ 於是港九救委會在 1953 年 7 月全面改組，由九龍總商會理事長謝伯昌（Robert Der, 1903-1981）擔任主任委員。謝伯昌和港九救委會從此成為臺灣救總在香港的重要代理人及代理機構。⁷⁴ 難民營成立時，不論是居民、港九救委會的富商們，或是英殖民政府官員，沒有人認為會是永久性的。1950 年 11 月 8 日，難民營成立

⁷⁰ 胡春惠專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3-10、19；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4-5。

⁷¹ 除了東華醫院外，當時還有 15 個慈善團體加入，大多為在港華商贊助團體。團體名稱一覽請參見 SCA, "Rennie's Mill Refugee Camp," (April 29, 1958),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1:2, appendix I.

⁷² 這其中主要的原因當然是因為港府懷疑這些人來港後，可能會進行人道救濟以外的政治活動，甚至謀報活動。詳見 HKULSCM, CO 1023/101 *Kuomintang Activities in Hong Kong, 1952-1953* 中的文件。

⁷³ 高卓雄後來成為中共官方論述中的「愛國商人」和「赤色資本家」，被授予「全國政協委員」等殊榮。

⁷⁴ 謝伯昌為廣東省台山縣人，赴港求學後到美國深造，1925 年學成歸國後先後在上海、香港知名企業擔任經理、董事，1946 年被推選為九龍總商會理事長。1953 年中華總商會易幟後，九龍總商會接下港九救委會的委任，在其後的四十餘年間，主導了救助大陸逃港難胞與調景嶺難民的工作。請參見九龍總商會編印委員會編，《謝伯昌先生追思錄》（香港：編者，1981），頁 1-6、145-172。

五個月後，高卓雄和港九救委會委員們陪同社會局副局長韋輝、救濟署長李子農和臺灣救總的專員陳頌平到營區視察。從他們當時對難民發表的談話來看，這一切都只是暫時性的措施，難民在不久後會全數前往臺灣。⁷⁵ 但是我們在下一段內容中將會發現，臺灣當局的入境政策讓調景嶺營難民的「歸鄉路」遙遙無期。

五、調景嶺難民營，1950-1961

難民在 1950 年 6 月底抵達調景嶺之時，見到的是一片人煙稀少的荒山野地。為了滿足難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港政府在 6 月中趕工完成了一些克難的工事，包括搭蓋營區行政所、興建簡陋的大廚室、設置儲水槽等。⁷⁶ 社會局和港九救委會也用油紙與木架搭起了一種像帳篷的臨時屋（稱 A 字棚），但是數量只夠容納約 3,000 人。後來的人，尤其是沒正式登記的民眾，只能像摩星嶺時期一樣，自己找材料搭蓋遮風避雨的小屋。當時除了在難民營之內約 6,800 名登記領有飯票的「合法」難民之外，另有約 9,000 名無飯票者聚集在附近的山頭，不時的出入。⁷⁷ 根據社會局 1950 年在營中的統計，全營共有 6,921 人，男 5,592，女 1,329 人。籍貫以湖南省佔第一位（1,245 人），廣東省其次（1,045 人），其餘包括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河北、江西等大陸各省人士，以不諳廣東話的「外省」人為主。但是，這些皆不包括無飯票之難民。⁷⁸ 社會局同時設立了「調景嶺營辦公處」，派主任方存適以下八位事務員進駐，處理物資發放、營區管理和協調糾紛等業務。同時把全營分為五區，下設保甲制度，成立糾察隊和伙食隊來負責營中的伙食和治安。⁷⁹ 在接下來的數月間，難民在社會局事務員的監督之下，胼手胝足，

⁷⁵ 香港社會局調景嶺難民營營報社編，《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2-5。

⁷⁶ James Wakefield to C.S., "Refugee Camp: Rennie's Mill, Hang Hau, N.T.," PROHK, HKRS156-1-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s, 1950-1957*, p. 9.

⁷⁷ 這是英方檔案中的人數，請參見 SWO to PRO, "Rennie's Mill Camp," (Memo. September 17, 1952),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根據林芝諺提供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 238 次會議紀錄，〈香港調景嶺調查實錄摘要〉（1951 年 8 月統計），有飯票人數為 6,819，無飯票 18,209，合計 25,028 人。在無飯票的難民方面，臺灣的統計數字要比英方的 9,000 人高出兩倍。

⁷⁸ 香港社會局調景嶺難民營營報社編，《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3。

⁷⁹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 27-28；王國儀，〈調景嶺滄桑五十年〉，頁 26；香港社會局調景嶺難民營營報社編，《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2。

成立各式的工作隊，利用有限的資源作基礎建設，陸續加蓋木屋、排水設施、小徑等，同時也成立了一間醫務所。因受共產黨之害而流亡的關係，難胞們對外來者和政治異議者有著極端的戒心與猜疑心。尤其是遷徙到營後約一個月，曾發生幾千人集體中毒事件，很多難民傳說是左派間諜混入營中下毒，但似乎查無實證。根據嶺內負責醫療之傳教士的說法，可能只是單純的食物中毒。⁸⁰ 當時在難民營中也成立了許多同鄉會和同學會等組織，除了在地的互助之外，最主要還是向臺灣的同鄉會和同學會求助，找熟人幫忙擔保入臺事宜。⁸¹

1950年7月，在社會局駐營辦公處的監督下，「調景嶺居民自治試驗辦公室」（以下簡稱「自治辦公室」）成立，由營中每省同鄉派代表兩名參加該會。其後營區自治糾察隊（義勇警察隊）隨之成立，同時進行區、保、甲長等選舉。林芝諺參考大量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資料後，指出自治辦公室的成員並不單純。從背景來看，社會科長和警保科長，均與國民黨有密切往來，甚至直接聽命於黨部。當時國民黨在調景嶺營已暗中派駐政工人員，如中改會第三組的調景嶺工作人員陳焜。由此推論，國民黨意圖將其組織滲入調景嶺營的動作甚為明顯，難民營內的區、甲、保長選舉也有濃厚的政治成分。⁸² 梁家麟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到：「調景嶺的保甲制度，絕非如日後所說的純粹為社會治安的緣故，事實上，至少在最早期的文字資料裡，我們看到所謂居民自衛隊裡，竟然有直屬「政工」的人員。」⁸³ 再者，難民營也成為早期國民黨在香港的政治、諜報活動中心。筆者收集的一份香港殖民部情資密件顯示，1950年代初在香港製造暴亂的「反共抗俄青年團」總部就在調景嶺內。⁸⁴

國民黨透過難民自治團體對調景嶺的滲透工作，可從《營報》中的一篇文章中略窺端倪，該文作者寫到：「行動思想的監視，和情感的聯繫，大都建築在同鄉

⁸⁰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37。

⁸¹ 王裕凱研究指導、陳勃等研究報告，〈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頁40-41。救總的相關刊物中有許多早期難民營中同鄉會所的照片。請見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11。

⁸² 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41。

⁸³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42，註19。

⁸⁴ “W.G. Aldington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November 27, 1952),” HKULSCM, CO 1023/101, *HK Kuomintang Activities*, pp. 77-82。

會和聯誼會各組織單位上面。」⁸⁵ 營區每天早上都會舉行升旗典禮。除此之外，還有慶祝雙十節、蔣總統誕辰等活動。早期的居民張寒松談到這些政治活動時說：

同鄉會、軍校同學會、各中小學校等都不需發動就來參加，但統籌的是自治辦公室。晚上有節目，還唱戲，好熱鬧，比後來熱鬧多了。當時大家都沒事作，人人都參加，人山人海。當然也有一些人不一定有興趣，但深怕別人懷疑他不反共，或立場不穩，都不得不參加。⁸⁶

香港 1950 年代出版的第三勢力雜誌如《自由陣線》和《中國之聲》中有非常多因為政治原因被迫離開調景嶺難民營的人來投書。⁸⁷ 有人一針見血的點出：「調景嶺難胞的生活是香港政府社會局管著，但控制難胞思想行動的，卻是『自由中國』密布的特務人員。失蹤、告密、被驅逐、亂扣帽子……一片暗影像雲霧似的壟罩著整個調景嶺。」⁸⁸ 有一篇題名為〈雙重難民之呼聲〉的文章，表達了早期許多失望離開者的心聲：

自從我們難民紛紛請求入臺並多方懇切呼籲後，臺灣竟將我們視同罪犯（理應以忠貞份子待我們），最初則派特務份子多方偵查我們，繼則收買少數份子向我們作情報工作，再則要我們在工作上有竭誠擁蔣的表現。於是我們難民中就有了許多組織，每個組織中便有了許多收買份子，這些收買份子，為了表示他們有工作並竭誠擁蔣起見，今天報告某某等曾靠而不攏，明天報告某某等參加第三勢力，甲報告乙，乙報告丙，丙又報告甲，暗中造謠，彼此不知，其實，都是受了特務的愚弄，弄得大家都疑心疑鬼，都是一群壞蛋。

⁸⁵ 正源，〈從摩星嶺到調景嶺〉，《營報》創刊號，1950 年 12 月 25 日，頁 12。

⁸⁶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42。

⁸⁷ 海峰，〈歡迎反共抗俄人士入臺嗎？〉，《中國之聲》1: 11（1951 年 12 月），讀者投書專欄；李明德，〈由調景嶺看臺灣的「民主」〉，《中國之聲》2: 6（1952 年 2 月），頁 10-11；周圍，〈難民的憤慨〉，《中國之聲》2: 4/5（1952 年 2 月），頁 13-15；李時民，〈一個難民在雙十節的感想〉，《自由陣線》7: 4/5（1951 年 10 月），頁 36；孫濟平，〈誰害了我們：大陸流亡學生的控訴〉，《自由陣線》13: 4（1953 年 2 月），頁 11-13。

⁸⁸ 青山，〈控訴：調景嶺生活實記〉，《自由陣線》9: 6（1951 年 4 月），頁 18。

這樣一來，整個的難民營便被恐怖的空氣壟罩起來了。換句話說，便被特務份子暗中所控制了。難民們，對於臺灣，只有歌功頌德的自由而不敢有半個字的批評了。只有看香港時報的自由而沒有看其他書報的權利了。如果有人看大公報，一定被指為共產黨，如果有人看中國之聲獨立論壇自由陣線甚至自由人等刊物，一定被指為第三勢力。最奇怪，難民營之中居然有黑法庭，可以裁決人，可以開除難民們的「難籍」。⁸⁹

現存的口述歷史中也有類似的描述。當談及營中是否有「匪諜」，以及為什麼去不了臺灣之時，張寒松的回答是：

那時有個不好的現象，我們有關的組織，譬如情報局、調查局以及大陸工作會，他們都在那兒發展組織，有些較不安分的，為了邀功，就會給人戴帽子。我相信十個中起碼九個都不是，我也被人冤枉過，說我是第三勢力。本來我很早就申請到臺灣去，我太太在臺灣有許多親戚，我們本是可以去的，卻不獲准，那時難民都希望能早點去臺灣，我也不知道被誰誣告我。⁹⁰

同時難民也對臺灣方面入境管制森嚴、發入臺證之程序充滿偏私與選擇性非常的不滿。有一位難友在投書中說：

我到調景嶺後，凡是臺灣可托的朋友都過曾寫信去，有些自稱與臺灣有關係的人物，也曾來調景嶺調查過，還填過表照過像，可是一年以來，如石沉大海，毫無消息，眼看見在臺灣有人事關係的，雖然是靠攏過的，也很快的去了，而我自問是純潔光明的反共人士，何以反只有在窮山海涯，過流浪生活？⁹¹

另一位山東籍的中校宋志成在一篇題名為〈誰真正反共，我擁護誰！〉的投書中指出，軍中派系對立的問題也是難胞入臺的阻礙之一：

⁸⁹ 王莪，〈雙重難民之呼聲〉，《中國之聲》2: 9 (1952年2月)，讀友信箱（雜誌背頁）。

⁹⁰ 胡春惠、李谷城、陳慧麗，〈張寒松先生訪談錄〉，收於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42。

⁹¹ 徐子謙，〈我要對臺灣表示抗議〉，《中國之聲》1: 8 (1951年11月)，讀友信箱（雜誌背頁）。

有一點，我是不甘心的。就是，軍隊中，派系分得太清楚。我只要引一個例。調景嶺的難民，軍人佔三四千，凡是與陳某（陳誠）老十八軍有關係的，連伙伙都到臺灣去了。與他們沒有關係的，不論有功無功，不論有能無能，他們一概置之不理。……今天，我們軍人死的死，流浪的流浪，他們很早就逃去臺灣，變成了忠貞份子，教我如何甘心呢？⁹²

1952 年 11 月，一個有家室的難民被營中的縣同鄉會開除會籍，不准入臺。只因為他響應了港府社會局用代金買回飯票的政策，想拿這筆錢與家人離營去做點小生意，卻被打了小報告。由於營中也有一千多人和他一樣，接受港政府的提案準備離開，於是救總秘書長方治寄了一封長達四千餘字的公開信，痛斥這些退了飯證的難民「不明大義」，開除這些人的同鄉會籍，不許入臺，並將他們的名字公布在調景嶺的《克難快報》上。這位難民覺得事情早在意料之中而處之泰然，且對臺灣方面的作法徹底失望，他在《自由陣線》的投書中說到：

在團結反共的大前提之下，我並不想為個人利益說什麼風涼話，或以私報公的攻訐政府。但是，許多天天口喊反共而做出事來實足以助共的人，也是應該徹底予以檢討。……三年來，我們逃難在香港，政府當局除派了兩次大員宣慰外，又有什麼呢？美好的言詞，究竟是不能充飢的。……老實講，我並不為我們的被開除難民營的同鄉縣籍或不能入臺而惋惜。我知道：政府如果是有誠意要我們入臺的，三年來並不見得就沒有入臺的機會，而一定要挨到今天。⁹³

從以上的種種證據來看，雖然聚集到摩星嶺與調景嶺的難民大多都是因反共而流亡，也都認同中華民國，想到臺灣發展，但他們不一定都認同國民黨在臺灣的作為，尤其是隨著時間的消逝，衷心期盼的臺灣接運船遙遙無期，許多人已經開始對國府產生反感。

上述可見自調景嶺成立以來，營中漸漸形成以同鄉會、同學會、社團組織、保甲自治機制為基礎，由臺灣國民黨透過救濟所主導、培育的政治勢力，講求服

⁹² 宋志成，〈誰真正反共，我擁護誰！〉，《中國之聲》1:9（1951 年 12 月），讀友信箱（雜誌背頁）。

⁹³ 自流，〈從我被開除縣籍說起〉，《自由陣線》12:4（1952 年 11 月），頁 16。

從、掃除異己。這與國民黨政權在臺灣重組時，清查外省移民，過濾可疑分子的情形相當類似。當然，調景嶺難民營中早期的「白色恐怖」比較臺灣的情形，還是有些許不同的。在英屬殖民地香港，難民可以選擇離開營區，到外面生活，徹底和這個「小臺灣」斷絕一切往來，就如同批評方治的那一位投書者與他的一千多名難友們。而在臺灣的戰後流亡人口，若成為黨國懷疑、清算的對象，通常無法逃脫那個世界，而成為國家暴力的受害者。從最基本的人群移動角度（移民史觀）來審視，讓筆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所謂「政治難民」的定義到底為何？一定要「跨國界的移動」（transnational movements）才會受難嗎？一定要是「沒有國家的移民群體」（stateless migrant groups）才可稱之為難民？還是「難民」的身分認定與稱謂只是國際政治競爭、權力遊戲下的產物，不能完全反映歷史現實與受難人民的需求？⁹⁴

筆者以上的分析，呼應了林芝諺早先的研究，在時間點上挑戰了香港學者藍安偉的說法，即國民黨的勢力是在 1953 年初，港府社會局撤出調景嶺後，透過救總與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c.）⁹⁵ 接手救濟的工作才開始發展。林芝諺發掘的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的會議紀錄⁹⁶ 與筆者收集分析的第三勢力雜誌投書則清楚顯示，臺灣在 1953 年以前就已經透過難民營中的同鄉會和保甲自治組織，對調景嶺內部情形所知甚詳，利用難民急於入臺、急於表示忠貞的心理，讓他們互相監視、報告，逐步將「問題分子」逐出營區（或是後者自行離去）。因此，調景嶺作為一個與本地社會不相容的社群，和其他移民研究中所認知的「少數族裔區」（ethnic enclaves）的成因、組織、與

⁹⁴ 前面引述的林芝諺和加拿大歷史學者 Glen Peterson 以及許多研究冷戰下的聯合國難民救援體系的研究，都已就這一點展開了許多批判和討論。有關冷戰期間全球國際難民救援體系的研究，請參見 Richard Black, "Fifty Years of Refugee Studies: From Theory to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 1 (March 2001), pp. 57-78; Charles B. Keely,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Regime(s): The End of Cold War Matt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 1 (March 2001), pp. 303-314.

⁹⁵ 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援知會）總部設在紐約，於 1952 年成立，1965 年結束業務（但主要的救援工作在 50 年代中期和後半期）。該組織是一個由美國政、商、媒體、宗教界親國府的人士組成的「民間慈善機構」，發起者及領導人為明尼蘇達州共和黨眾議員周以德（Walter H. Judd）。自 1953 年起，援知會陸續將約 14,000 名流亡港九的中國知識分子送到臺灣、美國、東南亞安置。詳見趙綺娜，〈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27: 2（1997 年 6 月），頁 65-108；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157-159.

⁹⁶ 林芝諺的論證工作十分的紮實，筆者在本論文中其實只提了一部分作為依據。

居民互動方式是很不同的，和所謂「母國」(home state) 關係也與其他受國際人道救援的難民群體不太一樣。跨界的聯繫當然是從最初開始就存在的。臺灣的政策影響了這個海外社群的形成和發展，而對這個難民社群的救濟活動和形塑，則成為國府在臺灣重新凝聚人心文宣工作中重要的一環。但這種跨界聯繫的性質和美國的華裔學者 Madeline Hsu (徐元音) 或是 Aihwa Ong (翁愛華) 等研究海外華人群體時提出的「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 的概念，在實質上又不同，最大的差異點在於國家規訓系統和政治暴力的介入，以及在地政權(港政府)對於這些情形在早期的放任態度。⁹⁷ 從救總秘書長方治，對接受港府社會局補助方案而自願離營的難民大聲責難，甚至遞出懲處的事實來看，國府的企圖心，昭然若揭。比起難民的福祉，在香港永續經營一個「反共精神堡壘」才是重點。梁家麟在《福音與麵包》中就指出，臺灣在 1953 年接手調景嶺的救濟工作後，救總歷年來透過港九救委會來援助難民、維持調景嶺的花費，遠大於把這一、兩萬人一次全接回臺灣定居，其動機不外乎是，在香港經營一個反共基地。⁹⁸ 而這樣的目的，也直接表現在《救總實錄》中討論「調景嶺的價值」一文中。這其中提到，這個地方可作為國府在香港的「人心測候所」、「國際宣傳站」、「發揚中華民族魂之地」、「人才培訓所」、「反共急先鋒」等。⁹⁹

證據顯示，不少中華民國的外邦盟友和海外僑界領袖，到香港時都曾到調景嶺難民營訪問。¹⁰⁰ 這些所謂的「慰問」，常使港府惱火，因為英方在難民營成立後不久就知道，國府將這些人全數接回的意願不高，而寧願拿他們來做國際宣傳。¹⁰¹ 根據一份社會局呈交「公共關係事務署」(Public Relations Office) 的公文中記載，1951 年 4 月 28 日，有三名美國人(其中一名為記者、一名為政府官

⁹⁷ 詳見 Madeline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⁹⁸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 44-45。

⁹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225-228。

¹⁰⁰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226。

¹⁰¹ 關於這一個議題，林芝諺在其論文中有相當深入的討論。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 (1950-1961)〉，第三章。

員、另一名身分不詳)不請自來,進入調景嶺難民營參觀拍照,停留了約 20 分鐘。當時因為社會局在營區值班的事務員剛好因病請假,另一名會說英文的職員又在偏遠地區辦事,來不及趕回來,所以在缺乏通譯的情況下,留守人員無法有效的勸阻這樣的行為,以及告知這些訪客進入營區需要社會局許可。這件事令局長麥道柯感到十分不悅。基於此事件發生前不久,也有美國議員在訪港時企圖到調景嶺「闖關」,而社會局又無法以發放通行證的方式,強行管制進出營區的人,因為考慮到聚集在營區附近幾千名「無飯票的寄生蟲」(unrecognized parasites),需要不時的進出。因此社會局只好函送公文到公共關係事務署,表示將在營區外豎立大幅英文告示牌,通知外來訪客入營前,須向社會局提出申請。¹⁰² 1954 年 7 月開始,社會局公布更嚴格的規定。除了調景嶺居民和有穿制服的政府官員,任何外來人士要出入必須要社會局發的核准狀。¹⁰³

既然不能夠信任臺灣會將難民全數接回,港府也有對應措施。在難民營成立後不到兩個月,社會局就試著收回廣東籍難胞的飯票,因為覺得這些人沒有語言障礙,在港可能也有親友,可自行出外謀生。此舉引來嶺民絕食抗議,最後只好不了了之。¹⁰⁴ 隔年,英方也曾宣稱難民營是暫時性的,嶺民需要快一點出去找工作或早日得到入臺許可,發放免費膳食將在不久後停止,此舉又引來難胞抗爭。1952 年初,英殖民政府開始有計劃的進行將難民解散及節省營區開銷的措施。¹⁰⁵ 首先,社會局官員知道有些難民離營時,不會將飯票繳回而擅自把飯票賣人,所以用突擊檢查的方式吊銷了 800 多張飯票。¹⁰⁶ 後來又有之前提到的飯票換一筆代金的方案。英方措施實行了九個月後成效頗大,原先的 6,800 張飯票銳減至 3,500 張,其中一千多人為瞎眼殘障的難胞。¹⁰⁷ 國民黨與救總的官方文宣在陳述這段

¹⁰² SWO to PRO, "Visitors to Rennie's Mill," (May 7, 1951),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2.

¹⁰³ SWO to all heads of departments, "Rennie's Mill Camp," PROHK, HKRS156-2-2876, *Refugee Camp for the Nationalist Soldiers at Rennie's Mill, Hang Hau, Junk Bay New Territorie, 1950-1957*, p. 50.

¹⁰⁴ 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32;王國儀,《調景嶺滄桑五十年》,頁 30。

¹⁰⁵ SWO to PRO, "Reduction of Expenditure at Rennie's Mill Camp," (January 11, 1950),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3.

¹⁰⁶ 吳建平主編,《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頁 133。

¹⁰⁷ SWO to PRO, "Rennie's Mill Camp," (September 17, 1952),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4.

歷史時，著重於難民的悲苦和絕境，這些「反共義士」的生計似乎受到了英方不近情理的對待。

然而，英方除了自身政治利益的考量外，其實也有不得已的苦衷。自 1950 年 6 月底至 1952 年 6 月底的短短兩年間，殖民政府花在維持調景嶺難民營的經費多達 370 萬港幣。而臺灣的救總在同一時期透過港九救委會援助調景嶺難民的物資、金額，只有約 50 萬港幣。¹⁰⁸ 1950 年 6 月韓戰爆發，英國政府屈從於美國的壓力，對中國大陸貿易實施禁運，香港經濟受重大影響，轉口貿易急速衰退，企業大量倒閉。¹⁰⁹ 面對急速萎縮的貿易稅收，戰後大量湧入、嗷嗷待哺的難民群，使得整個情況雪上加霜，港府財政捉襟見肘。港督葛量洪曾表示，1950 年代早期，殖民政府約三分之一的預算都直接、或間接的花在救濟和安置大陸難民上。他曾經多次向本國政府請款，包括寫信、面談、懇求，但卻沒有得到任何援助。¹¹⁰ 而根據 1953 年到調景嶺營服務的挪威女宣教士司務道的回憶，香港在 1950 年代早期並沒有得到世界上任何國家直接的協助（因為殖民政府自己都對外宣稱香港沒有難民問題），唯一能依靠的只有儘量爭取美國撥給「遠東難民計畫」（Far East Refugee Program）約 3 千萬港幣的食品補助。而港府每年花在社會福利上經費（大部分作為難民救助）約有 1 千萬。此外還有 5 千 5 百萬間接的會用在改善貧窮香港居民的生活。¹¹¹ 如果將以上支出和港府維持調景嶺的金額比較就會發現，國民黨難民營佔政府開銷額度，顯然遠高於其人數上的比例。

前面提到，1950 年 6 月至 1952 年 6 月的兩年間，港府維持調景嶺難民營經費為 370 萬港幣，一年的平均值則為 185 萬港幣。如果連沒有飯票的「非正式難民」都算在內的話，當時在調景嶺營的人口數約在 15,000 至 25,000 人之間。另一方面，香港在同時期的人口已超過 200 萬，而且大多赤貧，急需政府伸出援手。如果就港府透過社會局等機構每年救濟難民所花費的 1 千萬來看，調景嶺營的區區 2 萬人，居然佔了政府難民救濟年支出的近五分之一（18.5%），難怪英人無法

¹⁰⁸ SWO to PRO, "Rennie's Mill Camp," (September 17, 1952),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4.

¹⁰⁹ 劉蜀永，〈五十年來香港經濟的發展〉，收於胡春惠、李谷城、任少玲編，《五十年來的香港、中國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2001），頁 646。

¹¹⁰ Alexander Grantham,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p. 158.

¹¹¹ Gene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p. 129.

接受。在英人的眼中，對於這樣一小撮，已經清楚明白地表示效忠於臺灣政府的政治難民，長期的付出這樣大的花費，不僅不合其政治利益，相對於其他成千上萬戰後從大陸逃港的民眾（多為廣東貧農）也極不公平。當初之所以作出這一個樣子的決策，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覺得臺灣方面在不久的將來，會將這些人接走。而且種種的證據顯示，英殖民政府是樂於支付一切的照顧及運輸的費用，只要臺灣政府肯放寬入境審核程序及標準。

藍安偉在 2001 年時，訪問了 1953 年 2 月停止供應膳食的時候擔任社會局長的黎敦義（Denis C. Bray）。黎敦義在訪談中，提到殖民政府當時的處境及想法的時候說：「我們把有限的公家資源投注在照顧調景嶺營的人，但他們手腳健全，和其他不住調景嶺的數千人有何不同？所以這個政策缺乏正當性。」¹¹² 其實在領飯的居民中，有約一千多名瞎眼或是殘障的難民們（多為在內戰中負傷的國軍士官兵）還有他們的家人。¹¹³ 這些是沒有謀生能力，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社會局當時保證，在發飯停止之後，傷殘國軍還是會繼續得到照顧，直到臺灣來接他們。而在香港政府檔案處社會局相關文件中，也確實能看到，社會局官員為此所作的規畫和配套措施。¹¹⁴ 這些約千人的傷殘難胞是在 1955 年 9 月才由救總分批接到臺灣，而且還是在國外友人的爭取以及美援經費的幫助之下，國府才安置和收容這些人。¹¹⁵ 還有，如果我們認真檢視在早期的幾年間（1951-1955），由救總遣返回臺的約 2,000 名調景嶺難胞就會發現，這些很多都是被徵回去參軍的年輕人。¹¹⁶

¹¹²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 133.

¹¹³ 社會局的一份報告中提到：「雖然臺灣的救總會表示非常關心這些傷殘難胞，想把他們接回臺灣照顧，但直到 1952 年 9 月為止，還沒有一個人獲得入臺的許可。」"Quarterly Report for the Three Months 1 July to 30 September," HKULSCM, CO 1023/126, *Social Welfare Report Hong Kong, 1952-1954*, p. 77.

¹¹⁴ SWO to CUC, CP & PRO, "Closing of Rennie's Mill," (September 10, 1952),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5.

¹¹⁵ 根據司務道的回憶，1954 年夏天，聯合國派難民高級專員漢布茹博士來港調查中國難民問題時，由她陪同參觀了調景嶺營。在司務道的帶領下，漢布茹來到這千餘名傷殘國軍住的地方。一走進去，漢布茹當場被他所看到的景象嚇住，這些瞎眼殘廢的官兵，全擠在一間兩層高的舊房子裡，乏人照顧，場景非常淒涼。於是他到臺灣和蔣介石會面的時候，特別把這些人的處境告訴蔣，這些傷殘的官兵後來才能全數去臺灣。（Gene Gleason, *Joy to My Heart*, p. 139；司務道口述、尚維瑞撰，《荒原上：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二》，頁 20。）接運和安置調景嶺傷殘義胞是在救總和美國國務院遠東難民組的合作下達成，共花了新臺幣九百多萬，美方負擔了約（78%）的經費。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濟年報：第 7 年》（臺北：編者，1957），頁 30。

¹¹⁶ 根據救總資料，1951-1955 年間，調景嶺自治辦公室協助核准入臺的「思想純正」青年有 2,215 人。實際赴前線與參加游擊工作的有 1,143 人。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頁 15。

救總早在 1952 年初，就得知社會局計畫停止供應食物、遣散營區難民，但詳細日期尚未確定。¹¹⁷ 於是，1952 年 7 月間，派秘書長方治赴港勘查，和社會局局長黎敦義、副局長李子農洽談相關事宜。從方治的回憶錄和黎敦義 2001 年的訪談內容來看，雙方協商並不順利。在方治眼中，黎敦義是個提出無理要求（把調景嶺難民全部接回臺灣）、態度強硬、官場架子十足的人；而黎敦義則懷疑方治故意將協商中應保密的停飯日期，洩漏給親右派媒體，導致嶺民的絕食抗議。¹¹⁸ 因此當方治回到臺灣，因國內的反彈之聲而在 9 月 22 日致函黎敦義，懇請港府再次考慮停止供膳之時，黎的回函中是冰冷且堅定的回絕：

難胞意欲前往臺灣，惟貴會在處置此等難胞之入境方面，自亦頗多困難，對於此點，本局十分同情；不過關於貴會所稱香港政府之停伙決定，使貴會工作招致困難一點，本局似難同意。而調景嶺內幾乎三分之一全為盲瞎殘廢之輩，此等殘廢者，何以迄未蒙有關當局安置入臺？本局對此，尤屬難解！此種殘廢者流，按理宜於救濟上獲得優先之考慮；惟迄未有一人獲准入臺。香港政府及其他慈善機關，於此等殘廢之輩入臺手續方面，不僅願為其作各種需要之措置，且願代付其入臺之船費，關於調景嶺內凡持有飯票之難民，在停伙之後或停伙之前，如願入臺，可獲免費乘船之權利。此項免費船運難胞，將繼續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為止（即先生來港後之一年內）。……

最後余謹重複聲明一點，香港政府停伙之決定，並非一項突然之措置，實為數月前在原則上即已決定者，香港政府為維持此輩難民，幾達三年之久，經濟方面，蒙受重大之擔負，目下已無別法可想，不能再在此一方面，耗去如此巨大之支出。¹¹⁹

¹¹⁷ 1951 年 12 月，香港政府表示飯票不能無限期供應，要求難民及早離營，自謀生計。隔年的 1 月正式公告。救總曾透過港九僑團及工商領袖與港政府協商延長救濟期限。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頁 19。

¹¹⁸ 方治，《我生之旅》（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97-99；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p. 127; 142-143.

¹¹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229-230。

黎敦義的回應立場堅定、合情合理，臺灣方面自知理虧，無法再堅持。自 1953 年 2 月起，港府社會局停止救濟工作，在傷殘難胞離港赴臺後，將大部分人員撤出調景嶺營，只留下幾位事務員繼續做管理、諮詢和觀察的工作。

從此直到 1961 年，英殖民政府對調景嶺採取監視、觀察的態度。港府雖然希望難民們能自行離去，但並沒有強制拆除嶺內的廚房、醫療所、學校和其他設施。因為這些很多都是難民們辛苦出勞力興建的。再者，當時難民營中已有不少西方宗教慈善團體進駐（還有一所佛堂），共同分擔社會局的救濟、醫療和教育工作。這些教會組織定期發放的奶粉、麵粉、維生素錠、魚油、禦寒衣物等，常常是貧困無飯票居民賴以維生的東西。1949 年大陸政權易手時，數千名在中國的西方宣教士也成為「難民」，被迫要離開共產中國，有許多人轉向臺灣與東南亞的華人佈道。戰後香港湧進許多教會團體和資源，因為語言的關係（內地來的教士不會說廣東話），所以有非常多的教派到調景嶺營內建立據點，還有從摩星嶺時代就開始的教會和難民一起遷到調景嶺。根據梁家麟的研究，1950 年代調景嶺營教會盛況空前、信徒比例超過史上任何華人群體。1950 至 1955 的五年間就有約 2,000 人皈依不同的基督教派，3,000 人進了天主教會，佔了全營人口的 20%。¹²⁰ 難民們信教的原因，除了在流離中尋找心靈上的慰藉之外，主要還是成為教徒可以拿到救濟品，也就是所謂的「吃教」。因此教會在 1960 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工作機會與收入增加之時，在調景嶺就沒落得特別快。

1950 年代晚期開始，香港出口經濟的起飛使難民生活開始好轉。同時，有許多人去了臺灣或搬到市區。1950 年代開始在調景嶺活躍的教派中，其中比較重要的，有開辦「鳴遠中學」的天主教會、創立聖約翰小學的美國「路德會」、建立信義中學與靈實肺病療養院的宣道會和挪威信義會，以及錫安堂、崇真會、神召會等。¹²¹ 而在這個時候，也有一些剛從大陸逃出的難民紛紛來到調景嶺接受這些慈善團體的救助。臺灣的救總則隨著港政府社會局的退出，透過港九救委會擴大其在調景嶺的工作。理事長谷正綱發出「中國人救中國人的呼籲」，在港、澳、臺籌款，以難民自治委員會同鄉會等為基礎，繼續發展和經營在難民營內的勢

¹²⁰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 199。

¹²¹ 梁家麟，《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頁 81-127。

力。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接管社會局辦的兒童學校，將之命名為「調景嶺中學」（現在的景嶺書院），同時對鳴遠中學、信義中學、聖約翰小學等，提供圖書、儀器、教科書等。在實際的難民救濟方面則以發放「米代金」的方式代替飯票。新的「米代金」制度從 1956 年 3 月至 7 月間開始實施，只有 1954 年前到營的人才可以領取，以救濟 55 歲以上老人、16 歲以下兒童和寡婦以及殘疾人士為主。受惠者從開始約 1,200 人增加到後來的 2,000 人左右。¹²² 救總米代金發放由港九救委會監督、自治辦公室負責執行，大人每月 16 港元，小孩 10 元，家庭不論小孩多寡有一定的上限（約 70 元），通常不夠生活所需，所以大部分領米代金的家庭，也須外出工作。¹²³

六、徙置區調景嶺村，1961-1979

1958 年 1 月，柏利基爵士（Robert Black, 1906-1999，任期 1958-1964）從新加坡前來接替已經做了十年港督的葛量洪。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輔政司長，對香港的情形非常了解。他上任後不久即要求華民政務司對調景嶺難民營的情形作一個詳盡的報告，要在行政會議上，討論未來的政策方向。這個工作就落到當時已高升至華民政務司的韋輝身上。根據韋輝在 1958 年 4 月交出的報告書，1950 年代晚期的調景嶺，已非昔日貧苦的難民營。隨香港製造出口業的興起，戰後經濟開始起飛，許多工業區蓬勃發展，營區的人民可以外出找到好工作，生活顯然比一些其他寮屋區的新移民還要好。這點可以從居民的衣著與商店內的貨品看出來。因為外來救濟的關係，嶺內中、小學有許多都是免費入學（如救總的調景嶺中學），因為香港本身教育機構建設相當不足，尤其是中文教育，所以這些學校吸引了不少嶺外的學生前來就讀。¹²⁴ 1953 年初，港府停飯之前，營區人數曾一度到達 2 萬人的高峰，可是到了 1958 年時，只剩約 7,500 人，主要的原因是臺灣的

¹²²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總十年》，頁 20-21。

¹²³ 王裕凱研究指導，陳勃等研究報告，《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頁 37。

¹²⁴ James Wakefield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Rennie's Mills Refugee Camp," (April 29, 1958),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p. 1:1-1:3.

救總在 1953 年接手救濟工作之後，為了節省經費，陸陸續續接受將近一萬多名難民申請入臺。¹²⁵ 1957 年的《救濟年報》也顯示，1956 年時已有約 7,500 人獲准去臺灣。¹²⁶ 在這期間還有約 2,000 名居民因為找到好的工作而搬到市區去了。韋輝的報告書中談到，現存的幾千名居民似乎並不急著去臺灣，許多人雖然領到入臺證也不動身，有少數人去了臺灣又回來，寧願住在調景嶺。還有一些人，像自治辦公室現任主任，連向臺灣提出入境申請都沒有。¹²⁷ 關於這一點，曾在調景嶺自治系統中擔任「段長」¹²⁸ 的郝次航反映許多寧願留在香港者的心態：

那時要去臺灣很難的，起碼得有兩個將官擔保，條件很苛刻。後來我在民國四十五年去過。當年的香港比上海落後二十年，而臺灣又比香港落後。我想我在香港是混日子，如搬去臺灣又得重新混起，何必呢？不如在香港定下來算了！¹²⁹

韋輝的報告書中又提到，營中有約 2,000 名每月領救總米代金的人，有部分居民對挑選受益者和處理救濟款項的方式有意見，常常與自治委員會爭吵。¹³⁰ 難民營內還有約 2,000 名是長期出外打工者，只有偶而才回家。營區內也有私人經營的小型發電廠。約有 800 個家庭參與刺繡等手工藝產業，成品由教會負責行銷到美國。至於省籍的分布方面，由於二、三年來不斷的有外來人士從其他的寮屋區移入，像是住在邊緣地帶的廣東家庭（男主人多為大卡車司機），再加上許多 1949 年的難民家庭已經去了臺灣，因此廣東籍人口的比例已增至 45%。¹³¹ 由這個報告

¹²⁵ 一萬人是英方檔案中的數字。林芝諺提供的臺灣方面的資料也顯示，救總在十年間（1950-1960）自調景嶺總共接運了 11,008 名難胞，最多的一批在 1953 年（5,021 人）。而救總的接運量於 1958 年開始急速的下滑，之後每次都只有幾百人。請參見，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頁 217。

¹²⁶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濟年報：第 7 年》，頁 34。

¹²⁷ James Wakefield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Rennie's Mills Refugee Camp," (April 29, 1958),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1:3.

¹²⁸ 「段長」的職位和功能類似臺灣的里長。

¹²⁹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83。

¹³⁰ James Wakefield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Rennie's Mills Refugee Camp," (April 29, 1958),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1:2.

¹³¹ James Wakefield to Colonial Secretariat, "Rennie's Mills Refugee Camp," (April 29, 1958),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1:3.

內容來看，調景嶺在 1950 年代末期正因各種原因而急速的「在地化」，雖然大部分嶺民還是明顯傾向支持臺灣的國府，但至少去臺灣已經不是唯一的出路，尤其對年輕的一代而言。1957 年因做生意失敗才搬進調景嶺營的前國民黨軍官陳寶善，談及當時營內的情況時就說：「外省人的下一代完全都講廣東話。」¹³²

以韋輝的報告書為基礎，柏立基和他的行政首長們在 1959 年 2 月的會議中決定，將調景嶺難民營劃入香港政府正常的行政管轄體系之下，成為一般的「徙置區」。居民需要繳交土地使用證稅（permit fees），慈善機構辦的學校與診所需要向政府註冊，接受檢驗；政府則提供基礎建設，像是道路、郵政服務、警局、水道、衛生設施工程等。當時，葛量洪主政時期所發展的，以出口為導向的輕工業已取得初步的成績。在財源比較豐沛的情況之下，殖民政府在全港開始有計畫將戰後移民自建的木屋區（寮屋區），重新規劃成政府能抽稅與管理的徙置區。¹³³

除了增加稅收財源及改善施政效率之外，調景嶺難民營的改建計畫有著另一個更重要的政治目的。1959 年行政會議與會的首長們認為，雖然調景嶺營當時對香港的安全與政治利益已經沒有很直接的危害，但不能允許這樣一個親國民黨的社群長久立足於殖民政府的法律和行政管轄之外。¹³⁴ 可是他們同時也明白，調景嶺難民營與其他戰後難民聚集的木屋區不同，營中既存的政治勢力（難民自治委員會／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¹³⁵ 與他們背後的臺灣政府會反對，而且許多嶺民對國民黨還是抱持著強烈的認同感（因為政治異議者在早期都被趕走了），因此整個行動需要長期的規劃。¹³⁶ 於是港政府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作了許多跨部會的討論與沙盤推演，為 1961 年 6 月的接管行動，訂下十分周詳的計畫與步驟。這些包括在接管實施三個月前，於調景嶺的制高點設置一個警察局，派員警和熟悉難民營的社會局事務員收集各項情報，作家庭訪問，和一般民眾建立感

¹³²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68。

¹³³ Kenneth On Wai Lan,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 209.

¹³⁴ Colonial Secretariat, "Memorandum for Executive Council: Rennie's Mill Camp," (February 24, 1959),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82:2.

¹³⁵ 港政府於 1959 年明令禁止難民營內政治性社團和同鄉會等活動。因此，難民自治委員會在該年改組為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王裕凱研究指導、陳勃等研究報告，《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1959-1960）》，頁 25-26，40-41。

¹³⁶ SCA to CS, "Takeover of Rennie's Mill as a Resettlement Area," (February 3, 1961), PROHK, HKRS160-3-39,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1-1964*, p. 12.

情。¹³⁷ 同時在行動前召集營區內有影響力的人士，先取得他們的諒解，孤立臺灣主導的「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¹³⁸

1961年6月2日，殖民政府正式宣布將調景嶺難民營改劃成為「徙置區」後，營區內反對和請願聲浪不斷，駐營服務處，如港政府所預料般的帶領居民進行各式的集體抗爭活動，包括停工、罷課等。親國府的報紙如《香港時報》、《華僑日報》也對港府的決定，抱持批判的態度。¹³⁹ 臺灣的救總、紅十字會、立法院、監察院、國大代表在各大報也都發表了支援調景嶺難民的聲明。¹⁴⁰ 但是其實國府此時在調景嶺問題上的態度，顯然比1950年時低調許多。雖然不斷向香港政府表示對難民的關切之情，認為繳交土地使用證稅將造成貧窮民眾許多負擔，另一方面則希望嶺民和政府合作，不要製造太多麻煩。根據港府警務處政治部的情資，在接管前一個月，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副主任劉子固曾赴臺與救總的大員們共商對策，臺灣方面建議劉子固接受港府的政策。¹⁴¹ 這可能是因為，在1960年初，國府的軍事反攻計畫早已停滯，再加上想到臺灣的人大都已经去了。再者，在中華民國外交部與救總不斷的活動之下，香港的「難民」身分終於得到聯合國「世界難民年」(World Refugee Year, 1959-1960)活動的認可。¹⁴² 在達到主要政治目的後，國府最在意的是，調景嶺的名字與其所代表的反共精神象徵維持不變，以及救總透過港九救委會在嶺內的救濟和教育事業得以持續。¹⁴³ 1960年代，

¹³⁷ DSNT to DCS, "Rennie's Mill's Road and Police Station," (February 25, 1960),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33.

¹³⁸ 為了推行徙置區的政策，港府召集諮詢了難民營中一些特定的「有力人士」，從出席名單看來，多為在營內從事慈善工作的傳教士，親國民黨的勢力很明顯的被故意排除在諮詢工作之外。「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的前身即是由舊的保甲系統所組成的「難民自治委員會辦公室」。英方對這個國民黨在營中的主要政治勢力一直有很大的戒心。CR to CS, "Rennie's Mill Camp," (June 1, 1960),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p. 21:2, 28.

¹³⁹ 詳見1961年6、7月間香港各大新聞媒體的剪報，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⁴⁰ "Summary: Extract from Hong Kong Times dated 13.6.61.," PROHK, HKRS156-1-2877, *Rennie's Mill Camp-Resettlement-Press Cuttings 1961*.

¹⁴¹ DSB to CP, "Rennie's Mill Camp," (June 3, 1961),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 29:1.

¹⁴² 詳見林芝諺，〈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第三章。

¹⁴³ 這一點從1962年的《救濟年報》中對於調景嶺難民營改為徙置區處理經過的總檢討就可以看得出來。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救濟年報：第12年》（臺北：編者，1962），頁25-27。

救總在全港的活動實際上已從難民的接運和救助，漸漸轉向以「中國文化協會」為主的文教事業活動。¹⁴⁴

1961年7月初，徙置事務處長莫里臣（Colin G. M. Morrison）就嶺民兩次請願內容作出具體回應，承諾嶺民無限期的土地使用權，除少數必要工程，不拆遷現有的建築物。莫里臣也同意外地的慈善與教育機構，在政府的督導下，可以繼續在調景嶺進行工作，但否決了對於保留「難民營」稱謂的請求（但地名維持「調景嶺」），同時也堅持居民必須支付公定的土地使用證稅。¹⁴⁵ 其後，嶺民們在1963年3月土地徵稅實行之前，又有一次由劉子固領導的請願運動。然而，港府對於徵稅之事心意已決，因為當時政府已在調景嶺進行了許多基本公共建設，費用必須由民眾來負擔。¹⁴⁶ 調景嶺居民對這樣的結果當然還是心存不滿，但是來自臺灣方面的聲援僅止於口頭上的呼籲。國府似乎對調景嶺能繼續存在、救總的救濟與文教事業能持續的情形感到滿足，同時也對各項公共建設為難民帶來的福祉表示肯定。根據香港英文報紙的報導，國府在徙置工作開始不久就與嶺民們溝通，希望他們配合港府的計畫。¹⁴⁷ 所以，之後居民對進到調景嶺來作地形、人口、教育、衛生調查的徙置事務處人員所進行的各項工作，都非常配合。在接管作業進行僅兩個月後，港督柏立基在給本國「殖民地事務大臣」（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的簡報中就寫到：「雖然在管理這個孤立、政治色彩濃厚的社群，在未來還要面對一些棘手的問題，我們預期（徙置區作業）在短期之間是不會遭遇甚麼困難的，因此接下來我提議不用就此事再作匯報，除非有新的發展。」¹⁴⁸

英國殖民政府將這個「國民黨海外反共堡壘」納入正常管理後，救總／港九

¹⁴⁴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來說，在1962年因為大躍進和天災造成的「五月逃亡潮」中，估計有6萬人逃過邊境，救總只接運和安置了771人到臺灣（四四專案）。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五月逃亡潮來臺義胞安置工作》（臺北：編者，1964），頁3。而在另外一方面，1956年成立的中國文化協會則於1962年進入新的工作階段，贊助大陸流港失學青年，進行各項文教活動。

¹⁴⁵ “Hong Kong Government Turns Down Rennie’s Mill Request,” (July 6, 1961), *Hong Kong Standard*, 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⁴⁶ CR to CS, “Petition from Rennie’s Mill Village,” (April 17, 1963),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 51.

¹⁴⁷ “Taiwan Backs Government Plan for Refugee Camp,” (July 3, 1961), *Hong Kong Standard*, 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⁴⁸ Governor of Hong Ko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Colonies, “Rennie’s Mill Village,” (August 19, 1961), HKULSCM, CO 1030/1321, *Rennie’s Mill Hong Kong, 1960-1962*, p. 17.

救委會與嶺民間的關係似乎也起了微妙的變化。1962年10月，調景嶺難民營改為徙置區不久後，有居民以「調景嶺難民同啟」的名義發表匿名公開信，指責過去調景嶺的救濟工作，有分配不公的情形，掀起了一股指責救濟工作的暗流。而首當其衝的，是自1953年就擔任港九救委會主任委員的九龍總商會理事長謝伯昌。謝伯昌對這些指控矢口否認，他對於公開信中兩筆巨額款項的使用與發放提出具體說明，希望釐清真相。謝氏指出，第一筆款項「世界難民年中國委員會」匯發之美金12萬元（折合港幣約70萬元）已存入在港的美商銀行，尚未動用，其中5萬9千美金，已預訂為改建擴充調景嶺中學之費用，具體計畫已經擬定完成。第二，臺灣歷屆工商代表團到調景嶺慰問難胞時之捐獻共約9萬，除1961年所捐的2萬元尚未發放之外，其餘已清發完畢。¹⁴⁹ 第三，至於難民米證（米代金）之問題，都是按照救總方面的指示來安排。最後，他反控這些匿名的少數「造謠者」另有用心，與其他多數難胞無關。謝伯昌對前來訪問的《華僑晚報》記者說到：「本人光明磊落，捫心自問，絕無其他，所謂『真金不怕紅爐火』，罵者自罵，指責之種種既屬毫無根據……。」¹⁵⁰

事實上，香港警務處專門收集國民黨在港活動情資的政治部，很早就注意到調景嶺居民和港九救委會之間的摩擦。政治部的報告顯示，早在九個月前（1962年1月），臺灣救總就得知難民對港九救委會的作為有所不滿，於是派其審計部長來港稽查港九救委會的帳冊（該員還順便參觀了調景嶺的學校），藉以安撫民心。¹⁵¹ 因為沒有進一步的證據，我們現在還無法確認救總這位審計長到底查到了什麼、掩蓋了什麼，或是根本沒查帳，只是來表示關心、做做樣子而已。我們只知道，嶺民的不滿並沒有因此而平息，因此才有後來「公開信」的出現。從另一個面向來看，謝伯昌縱使提出了口頭的說明，但並沒有提出相關帳冊與收據以證明他的說法。當然，筆者在此也必須強調，這並不一定代表謝伯昌在發放救濟金和物資時不公或中飽私囊，因為不論是在香港警務處或其他現存的檔案資料，

¹⁴⁹ 原文中並未註明這9萬元和2萬元的幣別，但從上下文脈絡推斷，應為美金。

¹⁵⁰ 〈對於「調景嶺難民」公開信，謝伯昌昨加剖釋，造謠者另有用心〉，《華僑晚報》，1962年10月16日，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⁵¹ "Extract: Hong Kong Special Branch Summary," HKULSCM, CO 1030/1321, *Rennie's Mill Hong Kong, 1960-1962*, p. 11.

筆者皆未發現很明確的證據來支持當時對謝伯昌個人行為的指控。事件發生後，謝伯昌繼續得到臺灣的完全信任，在香港為國府的利益持續奮鬥，在國民黨官方和救總的歷史論述中，成為「功在黨國」的一代完人。¹⁵²

然而，這個在國民黨官方與救總歷史論述中鮮少提到的事件，其實在調景嶺的歷史發展中有很重要意義，不只如同謝伯昌對《華僑晚報》記者所說，少數「有心人士」，盜取難民的名義來中傷他。¹⁵³ 首先，這其中充分暴露出救總和港九救委會的獨占性、秘密運作及非透明化，讓許多嶺民心生不滿。在一份更早的（1961年12月）港警政治部報告中曾提到，世界難民年臺灣匯到香港的11萬9千美金當時全數存入謝伯昌在美商銀行的私人帳戶，其中一小部分（1萬1千港元）已經花在不知名的工程上，而居民們對於遲遲未領到一毛錢，感到非常不滿。接下來，港九救委會又自行召開會議決定這些款項的用處，而且只有很少數的人能參加這個會議。¹⁵⁴ 在這份報告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出，調景嶺居民不滿的理由源自於對港九救委會的專斷、閉門作業，以及無視於一般民眾的意見。在這樣的情形之下，當時居民確實有理由質疑這些資金的流向。

其次，我們在這裡需要思考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為什麼居民們選擇在1962年這個時間點公開的表示他們對港九救委會的不滿，而不是在稍早。在之前韋輝的報告中可以看到，這些因救濟金分配不均產生的摩擦在1958年以前就存在了。筆者的解讀是，當港政府將調景嶺納入管理時，之前不滿救總和自治委員會／駐營服務處舊勢力的民眾（包括屬於教會或未曾領受臺灣救濟金的人），就有了在地的政治後盾，使得他們覺得可以暢所欲言。調景嶺作為一個由外來的黨國勢力掌控，長期封閉的社群，至此開始產生轉變。後來其實又發生了許多類似的事件。舉例來說，1971年3月29日，四位調景嶺村的居民聯署上書，向當時的布政司

¹⁵² 謝氏晚年因其在港難民救濟、發展僑務及推廣文教事業上的貢獻，得到中華民國政府許多的表彰和職位。1971年獲頒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僑光獎、1972年委任中華民國港澳區立法委員、1981年獲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詳見九龍總商會編印委員會編，《謝伯昌先生追思錄》，頁3-4。

¹⁵³ 〈對於「調景嶺難民」公開信，謝伯昌昨加剖釋，造謠者另有用心〉，《華僑晚報》，1962年10月16日，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⁵⁴ "Extract: Hong Kong Police Special Branch Summary," HKULSCM, CO 1030/1321, *Rennie's Mill Hong Kong, 1960-1962*, p. 12.

署長羅樂民爵士 (Hugh Norman-Walker, 1916-1985, 任期: 1969-1973) 要求取消港九救委會駐營服務處與徹查相關帳戶。這份聯署書的內容顯示, 營中某部分的居民對駐營服務處及其前身自治委員會的不滿由來已久。我們也可以看到一些居民這時候已經組成不同的街坊團體, 有許多與劉子固主導的駐營服務處對立。¹⁵⁵ 另一組文件也顯示了, 在 1962 年時許多居民就想組織新的互助團體, 但是當時被 1959 年的社團禁令限制住了, 一直到 1969 年 11 月的時候, 有一群與救總駐營服務處長期對立的居民, 找到了一個法律上的漏洞, 創立了新街坊組織。他們向觀塘行政區申請成立一個名為「調景嶺區街坊福利會」(Rennie's Mill District 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 的「股份有限公司」, 開始進行各項活動。後來又有另外兩個團體也想向政府登記。¹⁵⁶

自從成為調景嶺村後, 調景嶺真正走向在地化, 慢慢的融入香港社會。由政府主導的公共設施興建, 如道路、公車、新的渡輪碼頭等, 改善了聯外的交通, 加速融合的速度。鄰近拆船廠的興建與觀塘工業區的發展, 為嶺民帶來了許多外出工作的機會。另一方面, 舊的政治勢力則隨老一輩居民的凋零逐漸消退, 尤其是救總的米代金在 1969 年停發時。¹⁵⁷ 九龍地區總監 (District Commissioner of Kowloon) 在 1974 年 2 月提供的一份會議報告顯示, 1960、1970 年代調景嶺村的人口數穩定維持在 7,000-8,000 人之間。在 1974 年的 8,245 名居民中, 約 23% (1,890 人) 是在 1964 年後才搬入, 這是因為港府對調景嶺內物業的買賣轉手採取非常寬鬆的態度, 意圖要削弱這個親國府社群的內聚性。報告中還指出, 雖然大多數嶺民仍傾向支持在臺灣的國民黨, 但臺灣方面的政治影響力已被「稀釋」(diluted), 調景嶺的商店中大陸製造的罐頭食物和器皿已處處可見。¹⁵⁸ 步入繁榮的 1970 年代, 碼頭上和建築物屋頂, 青天白日旗海仍舊飄揚, 反共復國、擁

¹⁵⁵ 〈王育璋等致布政司羅爵士〉(March 29, 1971),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 56:1.

¹⁵⁶ CR to CS, "Kaifong Association in the Rennie's Mill Village," (March 13 1970), PROHK, HKRS934-4-56, pp. 230-235; HAS to CS, "Associations in Rennie's Mill Village," (September 9, 1970),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 55.

¹⁵⁷ 自從 1950 年代晚期開始, 領救總的米代金受益者約有 2,000 人左右, 但在 1969 年 10 月時縮減至 120 人。CP to CS, "Rennie's Mill Village," (May 27, 1971), PROHK, HKRS890-2-44, *Rennie's Mill Village, 1960-1971*, p. 59.

¹⁵⁸ "The Future of Rennie's Mill Village," (March 23, 1974),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249.

護蔣總統的標語仍四處可見。每年雙十節、兩蔣壽辰等慶典仍持續。但這個社群的實際體質卻早已改變。1949 年的第一代難民們還懷抱著重返大陸的夢想，但是他們的兒孫們卻多已在地化。年輕的一代多外出工作，尋求在香港的發展。「調景嶺區街坊福利會」的主席王達權，在 1972 年接受香港記者採訪的時候說：「孩子們和我們不一樣，只有少數一些還和我們作著一樣的夢（重返大陸）。」王達權接著說：「我們在這裡已住了二十多年了，都習慣了，嶺民也都接受香港政府是我們的政府，而我們是這個城市的居民。」¹⁵⁹

只有一個地方還能真正感受到臺灣的影響力，那就是教授臺灣教育部核定課程的調景嶺學校系統。前述已提到，除了難民救濟之外，文教事業成為救總 1960 年後在香港的主要業務。調景嶺的中小學不但為香港中、下階級群眾，在 1960、1970 年代提供基礎教育的機會，同時也協同其他中國文化協會贊助的學府，像是珠海書院、新亞書院、德明書院、華僑書院等，開闢了到臺灣升大學或到國外深造的蹊徑。根據徙置事務處在 1963 年 11 月完成的第一次全面性調查，調景嶺村內有九所學校，學生人數 4,449 人，其中有 1,649 名學徒（約 37%）是從嶺外來的寄宿學生。¹⁶⁰ 除了全部經費由救總承擔、入學完全免費的「調景嶺中學」外，還有挪威信義會的「慕德中學」（信義中學）、天主教會的「鳴遠中學」、廣東同鄉會辦的「逸仙中學」、路德會的「聖約翰小學」、宣道會的「宣道小學」、觀音學校、德風小學、信義小學、中正小學（改徙置區後成立的第十間學校）。¹⁶¹ 陳寶善的回憶當中就提到，他在調景嶺買了房子辦起家庭式寄宿舍，收了 120 來個寄宿生，包食宿，晚上還幫他們補習。前前後後持續了二十一年之久。¹⁶² 王國儀則表示，1950 年至 1970 年的二十年間，香港教育制度不完善，98%的中小學為私校，不但教學品質參差不齊，且因為港府立案的大學數量太少，而畢業生多半無法繼續升學。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救總向教育部申請專案，凡調景嶺內各中學與高中應屆

¹⁵⁹ "Fateful Few Who Live in Hope," (August 4, 1972), *Hong Kong Standard*, PROHK, HKRS70-7-284,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NC+DIB, 1970-1975*.

¹⁶⁰ CR to CS, "Situation Report on Rennie's Mill Village," (November 2, 1963), PROHK, HKRS934-4-56, *Rennie's Mill Village, 1958-1974*, p. 160.

¹⁶¹ "Extract from Hong Kong Times," 〈區內無失學兒童，區外子弟也就讀，教育普及且水準極高〉(August 17, 1964), PROHK, HKRS70-1-247 (1), *Resettlement: Rennie's Mill Cottage Resettlement Area, 1961-1969*.

¹⁶²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頁 160。

畢業生成績在前兩名內，以及學業成績平均達 75 分以上、操行甲等者，皆獲教育部保送臺灣的大學。其他的學生則可參加教育部在港舉辦的大學聯招考試，每年報考的人數有 2,000-3,000 人以上。¹⁶³ 如考入國立大學，可免繳學費和住宿費。救總對調景嶺的清寒學生，也另有獎學金補助。¹⁶⁴ 如此一來，成就了不少的「港澳僑生」來臺接受高等教育。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來，當一個海外群體隨著在地化發展而變遷時，其和「母國」的交流聯繫方式也產生改變，反之亦然。

七、結論

1949 年共產中國興起時，有幾百萬的人，因為歷史的因緣際會，離鄉背井到臺灣和香港，有一小部分也分散到歐美國家以及東南亞。這可以說是，東亞近代史上，最大規模的一次人口遷移之一，但因國共內戰史觀以及冷戰國際關係等因素之下，1949 年大出走的人口遷移到臺灣的過程與在地經驗被簡化成「軍事撤退」、「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等論述。而戰後移民和其後代，在臺灣獨特的歷史發展中，成為今天的「外省人」族群，在同時期因相同原因移居香港的人，則成為需要被救濟的「難民」，其子孫現在都融入了香港社會，並沒有成為一個特別的族群。筆者認為，在討論 1949 大遷徙時，我們需要重新建立一個跨界式「政治性移民」的史觀和理論架構，將香港的調景嶺一併納入研究。這樣一來，我們將可釐清在這個遷移中，「移民群體」(migrant community) 和「移動政權」(migrant regime) 之間的關係。前述的討論中已經提及，香港的調景嶺群眾作為流亡海外的政治難民，其在政治上的選擇與遷移上的選擇（可以隨時回到大陸去）卻比和國民黨一起逃到臺灣的人還要多。此外，當黨國在營中的勢力因香港政府的徙置區政策而逐漸消退之時，難民營中第二代的在地化情形就更加的深化。和香港的比較可以幫助我們重新釐清，臺灣的黨國體制和政策對外省族群和意識在歷史上的形成，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這篇論文同時也是對臺灣第一代外省人研究近年來出現的「流亡／離散」(diaspora) 理論的一個回應。在分析外省流亡敘事的過程中，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¹⁶³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編，《文協十年，1962-1971》，頁 51。

¹⁶⁴ 王國儀，《調景嶺滄桑五十年》，頁 92-94。

教授趙彥寧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觀點：臺灣的第一代外省移民，應該被視為「中國流亡」(Chinese diaspora)或是「中國流亡者」(Chinese diasporist)。¹⁶⁵ 這個提議，不但對過去部分以「族群」(ethnicity)為主軸的論述及研究，將外省人群體的構成、文化結構、認同模式、和世代分歧等議題同質化／本質化所產生的問題，提出批判，同時也將「性別」、「階級」、「權力」、「國家機器」等相互作用關係和以「失根」、「流離」為主的政治移民概念，導入臺灣外省人研究，開拓和國際學界對話的空間。在這個新的理論架構下，1945年後從大陸來臺灣的人被視為「流亡者／避難者／移居者」，而「外省人」作為一個「族群稱謂」(ethnic label)不是一個先入為主的既定事實，而是一個「建構性的歷史進程」(historical process of becoming)。這和筆者試圖要建立的 1949 大遷徙的移民史觀和分析架構，不謀而合。

然而，現今國際移民研究中盛行的 diaspora 理論，¹⁶⁶ 作為詮釋臺灣戰後第一代移民歷史經驗的理論基礎，也有其相對應的問題。雖然所有被認為是 diaspora 的社群都是移民群體，但不一定所有的移民群體都是 diaspora。現在一般認為的 diaspora 通常是：一群人因政治因素被迫離開（或因經濟理由自願離開）原居地，在異鄉定居，同時移動到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地方。他們或出於自願、或受當地政府打壓、或受在地社群排擠，無法完全融入當地的社會，而在另一方面又和原鄉有實質上的往來（經濟活動、定期返鄉、收復失土／建國運動等）或想像性的聯繫（懷鄉書寫、紀念家鄉祭儀、文教活動等），而這一些連結成為這個移民群體和其後代集體認同的主要來源時，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移民群體有 diaspora 的特性。¹⁶⁷ 由這個認知來看，臺灣戰後的第一代外省移民被歸為類似這樣的群體，

¹⁶⁵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2001年3月），頁53-97。現在也有一些新的研究開始使用「流亡／離散」的概念來檢視臺灣戰後第一代移民的社會史。請參見黃克先，《原鄉、居地與天家：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經驗與改宗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2007）。

¹⁶⁶ 筆者在此試圖將臺灣外省人和香港調景嶺居民放在國際移民研究理論中討論，因此改用原文表現。

¹⁶⁷ 這是筆者匯集了 Gabriel Sheffer, William Safran, Paul Gilroy, James Clifford, and Robin Cohen 等學者對 diaspora 的詮釋和定義後，提出的一個綜合性的概念。實質上比較偏向於 Sheffer, Safran, Cohen 等政治經濟學派研究者所提的理論。詳見 Gabriel Sheffer,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Sidney: Croom Helm, 1986); William Safran,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 1 (Spring 1991), pp. 83-99;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1993); James Clifford, "Diasporas," in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44-277; 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1997).

明顯的有些問題。第一，世界史上大部分的 diaspora 都是跨國移民，在移居國成為弱勢的「少數族裔」(ethnic minorities)，集中居住在一些特定地點(enclaves / ghettos)，例如在歐美和日本等地形成的「少數族裔區」，像是紐約或橫濱的中國城。然而，臺灣戰後從大陸來的新移民是隨著一個在中國內戰中失敗的威權政權而來，他們雖和本地社會格格不入，有強烈的懷鄉／復國意識，也有一部分群居在與本地社群隔絕的「眷村」中，很多還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受害者，但在政治、文化上，這群少數人始終是強勢。本地人需要去適應和學習他們的文化、語言及政治制度，而不是他們需要去適應本地的情形。第二，在 diaspora 研究的分類學當中，雖然也有所謂的「帝國離散」(imperial diaspora)，但是臺灣戰後移民作為一個外來統治群體，又明顯和殖民時代在臺灣的日本人不同。¹⁶⁸ 他們除少數上層階級外多為中下階層官員和土官兵，因為內戰而隨國府遷臺。除了臺灣，也沒有分散到國府其他的「殖民地」去。第三，在 1949 大遷徙中，除了臺灣之外，有許多人到了東南亞，少數有特別政商關係者，去了歐美國家。但除了香港的調景嶺之外，這些地方似乎都沒有出現和臺灣關係密切的反共流亡群體。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仔細的審視這個「海外反共堡壘」的歷史發展與其和臺灣的關係。因為這個社群似乎是在 1949 大遷徙中，看起來可能最像 diaspora 的群體。

從調景嶺的起源和歷史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到，1950 年聚集到摩星嶺的政治移民有兩大特點。第一，他們有強烈反共復國意識、認同在臺灣的中華民國，不想在殖民地香港多作停留而想到臺灣去發展。第二，不論過去在大陸上的地位為何，這些人在香港多屬無產、無親屬、語言和文化背景和本地廣東華人社會不同的「外省人」。他們走投無路，漂泊無依，為了存活只好到摩星嶺和調景嶺接受救濟，一邊等待去臺灣的機會。而當過渡性的調景嶺難民營在 1950 年 6 月設立之時，國府透過救總與港九救委會和難民開始接觸、互動。國府在臺灣的入境管制政策和在營區滲透、建立政治勢力的舉動，對這個海外反共社群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同樣反共的「第三勢力」和其他表示政治異議者被驅逐，居民透過保甲自治等機制被掌控、規訓。以蔣介石個人領袖崇拜為中心的儀式及慶典

¹⁶⁸ “Imperial diaspora” 的概念是由牛津大學國際移民研究中心的 Robin Cohen 所提出來的，指的是因歐洲殖民帝國的擴張而從母國被派駐或移民到殖民地的英、法、德、荷、西、葡等國的人士。Robin Cohen,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pp. ix-xii.

成為忠貞規訓系統中重要的一環，也成為調景嶺文化精神上永久的表徵。1953年初，在遣返工作長期停滯後，港府社會局為了縮減經費，停止膳食供應，撤出營區，對調景嶺難民採取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讓臺灣的救總接手難民救濟工作，繼續發展以黨國為中心的政治勢力和文教事業。然而這些跨界的聯繫和影響則因為 1950 年代中期後的難民遣返工作、香港經濟起飛、新住民的移入，在 1950 年代晚期、1960 年代早期開始逐漸消退。香港政府其後為了改善嶺民生活、遏止國民黨在營區的勢力、加速嶺民和香港社會的融合，在 1961 年 6 月將調景嶺難民營改為「徙置區」，納入政府公共行政管理體系。自此之後，黨國在營中的勢力日益淡化，居民在地的趨向性逐漸加強，尤其是反應在年輕一輩的身上，再加上來自臺灣救濟物資的縮減，救總／港九救委會體系之外街坊組織的成立，使得「海外反共基地」之說，在 1965 年後徒具象徵意義而無實質。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在 1960、1970 年代，調景嶺因為外來救濟而收費低廉的學校系統，為缺乏教育機會的香港中下階層群眾另闢了到臺灣升大學的蹊徑。這又是另一種形式的跨界移動，在某些程度上呼應了「文化精神堡壘」之說。當一個海外群體隨著在地發展而變遷時，其和所謂「母國／祖國」的主要交流聯繫方式也產生改變，反之亦然。

從這一些歷史經驗來看，調景嶺社群在特定的歷史時空中，確實有一些 diaspora 的性質存在，這些人被迫離鄉背井，窮愁潦倒，有強烈復國返鄉意識、難民意識。因為港政府的集中隔離政策，他們在早期和在地社會有明顯的距離感，連偏遠的大嶼山居民都不歡迎他們暫居。調景嶺居民和「家鄉」一直有實質的往來或想像性的跨界聯繫，只是我們已經看到，這些連繫的程度和性質也會隨著歷史時空而改變。調景嶺最大的特點在於，同時有兩個「中心／家鄉」：大陸上的原鄉和中華民國所在地的臺灣。所以當難民被「遣返」（或自行前往）「自由中國」時，他們回到的是個從未去過的「家鄉」，而調景嶺是否又成為他們在臺灣生活經驗中第三個「家鄉」呢？他們在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返鄉探親時，是否和臺灣去的人有類似的經驗呢？這些是將來需要去研究，耐人尋味的問題。最後，調景嶺社群在 1961 年後，在地化非常的快，所以第一代的流離意識、對「家鄉」的想像和中興復國的歷史情感，似乎並沒有影響到下一代，這點和臺灣第二代外省

人的情形非常不同。在整體的比較上，無庸置疑的，香港調景嶺社群比臺灣的第一代外省人更具有 diaspora 的特性。但是我們也同時必須考慮，臺灣戰後移民中的一些特定群體，像是 1950、1960 年代到東部開墾的下階層老兵，因為他們的流離經驗、窮困和與主流社會的疏離，或許也可以被歸類為一種 diaspora。更重要的是，我們也需要和二十世紀中其他反共流亡群體，像是在美國的古巴難民和南越政權的流亡者比較，以期能更深入的了解 1949 大遷徙的性質與歷史定位。

引用書目

Hong Kong University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Microfilm (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特藏微縮膠捲)，
微捲號：CO 1023/101、CO 1023/126、CO 1030/1321、CO 1030/326。

Public Records Office of Hong Kong (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館)，檔號：HKRS156-1-2876、HKRS156-
1-2877、HKRS160-3-39、HKRS41-1-5240、HKRS41-1-6141、HKRS70-1-247(1)、HKRS70-7-284、
HKRS890-2-44。

《中國之聲》，1951年-1952年。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自由陣線》，1950年-1953年。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營報》創刊號，1950年12月25日。香港：香港大學孔安道紀念圖書館藏。

九龍總商會編印委員會 (編)

1981 《謝伯昌先生追思錄》。香港：九龍總商會編印委員會。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編)

1951 《一年來之救災工作》。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1957 《救濟年報：第7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1960 《救總十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1962 《救濟年報：第12年》。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1964 《五月逃亡潮來臺義胞安置工作》。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1970 《救總二十年紀念專集》。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

中國災胞救助總會 (編)

1993 《調景嶺回顧錄》。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

方治

1986 《我生之旅》。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王國儀

2008 《調景嶺滄桑五十年》。臺北：中華救助總會。

王裕凱 (研究指導)、陳勃等 (研究報告)

1960 《香港調景嶺難民營調查報告：為響應世界難民年作 (1959-1960)》。香港：香港大專社會問題研究社。

司務道 (口述)、尚維瑞 (撰)

1983 《陝西羚蹤：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一》。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

1985 《荒原上：司務道教士自傳之二》。香港：靈實醫院靈實福音佈道團。

白家祺

1954 《摩星嶺之役》。臺北：黃埔出版社。

吳建平 (主編)

1958 《調景嶺義民反共奮鬥史實》。臺北：寰聲文化出版社。

李正寰（編）

1991 《谷正綱先生與救總》。臺北：中國災胞救助總會。

林芝諺

2009 〈冷戰下中華民國的難民政策：以香港調景嶺營難民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1）〉。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冼玉儀、劉潤和（編）

2006 《益善行道：東華三院 135 周年紀念專題文集》。香港：三聯書店。

侯禹昌（編）

2004 《耕耘：救總五十四載工作紀實》。臺北：中華救助總會。

胡春惠

2000 〈香港調景嶺營的出現與其在歷史上的意義〉，收於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輯，《港澳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533-548。臺北：國史館。

胡春惠（主訪），李谷城、陳慧麗（紀錄整理）

1997 《香港調景嶺營的誕生與消失：張寒松等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

香港中國文化協會（編）

不詳 《文協十年，1962-1971》。香港：香港中國文化協會。

香港調景嶺中學（編）

1960 《嶺中十年》。香港：香港調景嶺中學。

張一帆

1954 《春到調景嶺》。香港：亞洲出版社。

梁家麟

2000 《福音與麵包：基督教在五十年代的調景嶺》。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

2002 〈五十年代宣道會在調景嶺的工作〉，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頁 131-15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陳正茂

2007 〈滄桑五十年：記民社黨在臺灣〉，《傳記文學》91(6): 34-51。

2008 〈五〇年代香港第三勢力運動歷史料之介紹與略評〉，《傳記文學》92(6): 57-66。

2008 《中國青年黨研究論集》。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編）

1959 《香港調景嶺營難民概況》。香港：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

黃克先

2007 《原鄉、居地與天家：外省第一代的流亡經驗與改宗歷程》。臺北：稻鄉出版社。

趙彥寧

2001 〈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1: 53-97。

趙茲蕃

1953 《半下流社會》。香港：亞洲出版社。

趙綺娜

- 1997 〈冷戰與難民援助：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九年〉，《歐美研究》27(2): 65-108。

劉義章

- 2002 〈宣教士在調景嶺難民營的醫療服務〉，收於劉義章、黃文江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頁 113-129。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 2005 《盼望之灣：靈實建基五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

劉義章、關之英

- 1998 〈香港調景嶺研究：教育篇〉，《史藪》3: 357-379。

劉蜀永

- 2001 〈五十年來香港經濟的發展〉，收於胡春惠、李谷城、任少玲編，《五十年來的香港、中國與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646-656。香港：香港珠海學院亞洲研究中心。

戴樂群等（編著）

- 1995 《靈實醫院四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基督教靈實協會。

薛化元

- 1994 〈張君勱與「自由中國」政府（1949-1969）：以「第三勢力」論為中心的考察〉，《臺灣風物》44(4): 61-96。

Black, Richard

- 2001 "Fifty Years of Refugee Studies: From Theory to Polic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1): 57-78.

Clifford, James

- 1997 "Diasporas." In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hen, Robin

- 1997 *Global Diaspora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Press.

Gilroy, Paul

-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London: Verso.

Gleason, Gene

- 1966 *Joy to My Heart*. New York: McGraw-Hill.

Grantham, Alexander

- 1965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Hambro, Edvard

- 1955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Holland: A.W. Sijthoff-Leyden.

Hsu, Madeline

- 2000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1882-1943*.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ly, Charles B.

- 2001 "The International Refugee Regime(s): The End of Cold War Matter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1): 303-314.

Lan, Kenneth On Wai 藍安偉

- 2006 "Rennie's Mill: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 Special Enclave in Hong Kong." Ph.D. dis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g, Aihwa

- 2000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Peterson, Glen

- 2008 "To Be or Not to Be a Refug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Hong Refugee Crisis, 1949-55."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2): 171-195.

Safran, William

- 1991 "Diasporas in Modern Societies: Myths of Homeland and Return." *Diaspora* 1(1): 83-99.

Sheffer Gabriel

- 1986 *Modern Diaspora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ndon/ Sidney: Croom Helm.

Sinn, Elizabeth 洗玉儀

- 2003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mart, Alan

- 2006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now, Philip

- 2003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Yang, Tianshi (Trans. By Wong Young-tsu)

- 1992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North America in the 1950s." In Roger B. Jeans, ed., *Roads Not Taken: The Struggle of Opposition Partie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pp. 269-273. Boulder: Westview Press.

Yu, Wai-lun, Alan

- 1997 *The Clearance of Rennie's Mill Squatter Area*. Master Thesis,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Rennie's Mill: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ttle Taiwan" in Hong Kong, 1950s-1970s

Dominic Meng-hsuan Yang

ABSTRACT

This monograph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pro-KMT" enclave in Hong Kong called Rennie's Mill or Tiu Keng Leng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 The narrative is constructed from a large collection of sources including archives of the British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in Hong Kong, publications of Free China Relief Association, magazines published by the Third Force in Hong Kong, and an oral history anthology compiled by Academia Historica. There has hitherto been littl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Rennie's Mill community. Existing studies focus o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monstrate that "humanitarian" assistance rendered by the KMT to the residents of Rennie's Mill was mediated by anti-communist agenda, and by Taiwan's own security concerns. This study take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y providing an intimate profile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nnie's Mill from a refugee camp in the 1950s to a "cultural diaspora" of the KMT in Taiwan during the 1970s. The interpretation will add depth and nuance to the current research and debate on diaspora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tudies by offering a unique case study. In sum, this monograph constitutes part of a greater effort to re-consider the 1949 exodus from a cross-border/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Keywords: Political Migrants, Chinese Civil War, Diaspora, Refugees, Taiwan, Hong Kong, Cold War

